

#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5年11月30日第21期  
总第144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 《记忆》144期

### 目 录

#### 【专 稿】

唐少杰 文革中军官的集体觐见

——毛泽东文革初期接见解放军十万余名团职以上干部刍议

#### 【评 论】

李伟男 九零后观文革——来自一个非亲历者的视角

李 逊 张春桥和《有感》

#### 【要有光】

胡 杰 嫂子问：“你怎么才来？”就咽下最后一口气（版画）

依 娃 寻找逃荒的妇女娃娃——李桂兰、刘玉芬、刘慧霞、牛玉凤访谈

#### 【大饥荒】

陆 凌 一九六零年（二）——三年自然灾害

#### 【述 往】

漂 木 军垦农场里的“性”——大学生“再教育”中的“四不准”

慰 祖 家世拾零——我的爹爹和父亲（一）

王丕忠 《镇反纪实——我的劳改三十年》之（三）——提篮桥监狱

#### 【资 料】

1. 1967年2月22日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誓师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2. 1967年3月2日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3. 1967年4月21日北京市革委会给毛主席的致敬信

#### 【版权声明】

【专稿】

## 文革中军官的集体觐见

——毛泽东文革初期接见解放军十万余名团职以上干部刍议

唐少杰

一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且不带引号）时期有两类非常关键的接见活动，一类是众所周知的毛泽东 1966 年 8 月 18 日至 11 月 26 日在北京先后八次接见来自各地 1100 余万红卫兵学生和群众代表等，另一类是毛泽东 1967 年 9 月下旬至 1968 年 8 月中旬在北京先后十多次接见解放军十余万团职以上干部。<sup>1</sup> 人们对于前一类接见活动颇

<sup>1</sup> 关于毛泽东文革初期接见解放军十余万名团职以上干部的信息，可参见《解放军报》如下的一系列报道：

一、1967 年初，毛泽东、林彪等接见军事训练会议的代表近 200 人（《解放军报》1967 年 7 月 8 日，第 3468 号）。二、1967 年 9 月 26 日，毛泽东等接见正在北京学习的各省军事干部以及在京开会的一些省、市、区的军队领导人（《解放军报》1967 年 9 月 27 日，第 3548 号）。三、1967 年 11 月 13 日下午，毛泽东等接见了出席北京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代表、出席空军党委全体会议的人员等（《解放军报》1967 年 11 月 14 日，第 3596 号）。四、1967 年 11 月 14 日晚，毛泽东等正在北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军队干部和革命群众代表、军队干部、地方干部等等（《解放军报》1967 年 11 月 15 日，第 3597 号）。五、1967 年 12 月 3 日，毛泽东接见海军首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代表、通信兵驻京直属机关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代表以及在文革中参加接待革命群众的工作人员等。六、1967 年 12 月 31 日，毛泽东等接见在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解放军干部、各地党政干部、革命群众代表、空军直属机关和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代表，在京开会的一些省市区的群众组织代表、解放军干部、地方干部和出席国防科委会议的人员（《解放军报》1968 年 1 月 2 日，第 3645 号）。七、1968 年 1 月 26 日，毛泽东等接见总参谋部第四次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代表、总后勤部第二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代表、空军第二次学习毛主席著作代表大会代表、第二炮兵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代表等（《解放军报》1968 年 1 月 27 日，第 3670 号）。八、1968 年 2 月 19 日，毛泽东等接见北京卫戍区部队和在京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部队代表，以及 8341 部队的指战员（《解放军报》1968 年 2 月 20 日，第 3693 号）。九、1968 年 3 月 8 日，毛泽东等接见出席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通信兵、防化学兵、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代表，以及在京出席专业会议的代表。十、1968 年 3 月 27 日《解放军报》第 3729 号报道，毛泽东等“最近接见了军队干部”，被接见的有：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各军兵种、驻京各军事院校、北京军区所属部队各单位的团以上干部，在京参加三支两军的干部，共计一万余人。十一、1968 年 5 月 8 日，毛泽东等接见在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

为熟悉，论及较多，而对后一类接见活动不太注意，较少提及。我的一位亲人1968年6月下旬来到北京，参加了这种毛泽东接见的活动。在与自己的亲人讨论这种接见活动时，我心中就泛起了探讨这类接见活动的想法。无独有偶，今年夏天，我在读邱会作与儿子关于文革的对话录时，颇有兴趣地看到了他们父子谈及了这一类接见活动。我个人认为，邱氏父子的这一谈论，大概是在迄今为止的文革回忆和研究领域中第一次提及毛泽东的这一类接见活动问题。尽管现今还受到当时的有关文献资料没有开放或没有解密的限制，但是我觉得，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很值得研究文革的学者加以重视和深入下去。

毛泽东在1967年年初文革进入高潮之后，特别是同年武汉“七二零事件”之际，他与解放军尤其是与解放军高、中层干部的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状况，具有整个文革初期这种关系前所未有的非常微妙的特点。所以，毛泽东出于自己的种种考虑，更多地是基于他本人的文革战略及策略，决定接见解放军全军现任的团职（即副团级）以上全体干部。正如邱会作所指出的：“七二零事件”之后，“毛主席提出加强对干部进行思想教育，建议办学习班，军队要对全军团以上干部轮训一遍。军委办事组承办了此事，每批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上万人到北京学习。那些终日被‘炮轰’揪斗、焦头烂额的各省市的领导干部，

---

班的军队、地方、群众代表，全国铁路、交通会议的代表和军管会负责人，以及出席一些专业会议的代表（《解放军报》1968年5月9日，第3772号）。十二、1968年5月20日，毛泽东等接见在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国防科委第二次学习毛主席著作代表大会代表、中国科学院首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代表，出席煤矿抓革命、促生产会议的职工代表和军管会负责人，以及接待革命群众的工作人员，共两万多人（《解放军报》1968年5月21日）。十三、1968年6月3日晚，毛泽东等接见了解放军南京地区、沈阳地区陆、海、空部队毛泽东思想干部学习班人员，海、空部队毛泽东思想干部学习班以及各总部、各军兵种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和出席一些专业会议的人员，共两万多人（《解放军报》1968年6月4日，第3798号）。十四、1968年6月30日，毛泽东等接见济南军区、广州军区、兰州军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煤炭会议代表以及其他方面的“革命战士”，共计两万多人（《解放军报》1968年7月1日，第3825号）。十五、1968年8月11日，毛泽东等接见解放军福州、武汉、成都、昆明、新疆、西藏地区陆、海、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人员，出席海军第二次四好联队代表大会和北京地区炮兵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代表，以及在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一些地区的干部战士（《解放军报》1968年8月12日，第3867号）。十六、1968年8月15日，毛泽东等接见“首都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首都工人的代表”，同时还接见了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北京卫戍区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人员，以及参加一些地区在京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革命战士。（《解放军报》1968年8月16日，第3871号）。

那些整日被纠缠得疲惫不堪的军队三支两军<sup>1</sup>干部，终于有了喘息的机会。”<sup>2</sup> 不过，在我看来，对于毛泽东而言，接见军队干部主要不是什么使解放军广大干部得到喘息的机会，而是毛泽东在文革初期对于他与解放军之关系的一次重大、具体的深化，是使解放军整个干部队伍的上上下下更加有力、更加有效地与文革保持一致的契机。邱会作的次子程光（邱承光）本人给予这类接见活动做了一个比较恰切的定位：“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地接见军队人员，可以和1966年他接见红卫兵相比。他为了发动红卫兵搞文化大革命，搞了八次接见，检阅了上千万红卫兵。现在他大量地接见军队干部，和接见红卫兵是不是异曲同工？要求军队支持他搞文化大革命。”<sup>3</sup>

李作鹏在其回忆录中提及这种接见，更多地是从他所主持的军队文革的角度来谈的：“从1968年1月起，海军办了六七期学习班，每期时间二至三个月，每期人数有百余人，参加学习班的干部共计千余人。学习班的学员，主要来自海军开展四大单位中的团、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和参加各省地方‘三支两军’工作的海军各级干部。让他们脱离原单位，集中到北京学习。”“1968年5月20日，毛泽东、林彪及其他中央领导接见了海军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全体同志。毛、林接见海军学习班的学员，不仅使参加接见的学员倍受鼓舞，而且也是对海军以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方式解放干部的肯定。”<sup>4</sup> 从李作鹏的这一回忆里，很难看出毛泽东在其接见军队团职以上干部的活动中所起的主导作用。而在邱会作的回忆录及对话中，毫无疑问地把这种接见的由来归置于毛泽东。邱会作谈到，平常请毛泽东出来是很难的事情，“而那时毛主席兴致非常高，只要军委办事组请，他就来接见，可以说是不厌其烦。各总部、军种、兵种、各大军区来京学习人员，陆海空三军学习毛着先进表彰大会的代表，他接见了个遍，有时还问我们还有要见的吗？在接见现场，我们把各大单位的领导介绍给毛主席，他都要一一握手，遇到认识的，还要说上几句话，显

<sup>1</sup> “三支两军”是指文革中解放军的“支左、支工、支农、军训、军管”。

<sup>2</sup> 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第157页，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

<sup>3</sup> 同上。

<sup>4</sup> 李作鹏：《李作鹏回忆录》下卷，第626-627页，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

得非常亲切。”<sup>1</sup>可以说，正如毛泽东接见上千万名红卫兵和群众代表是他自己的主张和决定，毛泽东接见解放军十余万团职以上干部也完全是他自己的主导和铺排。

## 二

显而易见，毛泽东接见解放军十余万团职以上干部的活动（以下简称“毛泽东接见军队干部的活动”），是毛泽东在文革进入第二年和第三年的一项重要举措。

首先，毛泽东接见军队干部的活动与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学生和群众代表的活动，既有相似的地方，又有不同的特点。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学生和群众代表，既是毛泽东一生中的一项独特而又重要的活动，更是毛泽东发动和引导文革的一项必要而又深远的举措。通过支持和推进红卫兵运动，具体地说就是通过接见广大的红卫兵学生和群众代表，毛泽东不仅有了一支使文革冲向中国大陆社会各个领域、各个阶层和各个角落的所谓“天兵天将”，而且以红卫兵运动迅猛而又突进的狂飙，清除了来自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内的、被毛泽东称之为“三个很不”（“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文革阻力。<sup>2</sup>毛泽东以接见红卫兵的方式，让红卫兵们来北京“朝圣”和“取经”，观摩和汲取北京的文革运作，无形之中使红卫兵运动成为文革贯彻、普及、深入到全社会的“政治推土机”。正是通过接见红卫兵，毛泽东在中央、在党内、在全国找到了使文革广泛而又迅速地运行起来的契机或模式。所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从文革全局或整体意义上讲，是毛泽东把文革全面铺张开来的一大创举！但是，仅过了大半年，毛泽东就已不看好红卫兵了。例如，毛泽东1967年2月接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5月接见该国军事代表团时，就对红卫兵学生及其造反派代表人物的作用表示过疑虑<sup>3</sup>和批评<sup>4</sup>，在7月至9月北京和外地极“左”实

<sup>1</sup> 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第157页，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

<sup>2</sup>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8月8日），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二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6年版。

<sup>3</sup> “毛泽东接见卡博和巴卢库时的谈话（1967年2月3日）”，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二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6年版。

<sup>4</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下）第1489-149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践及其思潮达到顶端时(以北京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为例并以全国性的各地区的武斗滋生、蔓延为例)，毛泽东恰在这一时期的外地巡视中就不止一次地说过：“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sup>1</sup> 实际上，毛泽东到了1967年9月之际，已经不看重红卫兵学生和造反派群众了。

自1967年年初开始，在全国许多地方，随着造反派群众及其势力的崛起，各地解放军日益卷入当地的文革事务及纠纷，军队与造反派群众及其势力的矛盾、对峙甚至冲突不断扩大和加深。毛泽东一再力图让各地解放军大力支持造反派，力图使二者的关系得以缓和或协调发展。但是，1967年武汉“七二零事件”的发生，武汉军区领导人以及武汉军区领导机关众多干部对于武汉地区激进造反派的打压和对保守派群众的支持，拒绝周恩来代表以毛泽东为首的所谓文革“无产阶级司令部”对他们的指责，特别是驻扎在武汉市城区的湖北省军区独立师官兵所举行的声势浩大的武装游行示威和随后所发生的围攻、殴打中央文革小组大员的事件，都是此时正居住在武汉“七二零事件”中心地带的毛泽东所不愿意看到的甚至所预料不及的，最终使毛泽东迫不得已地离开武汉。<sup>2</sup> 稍后，毛泽东对以武汉军区为代表的军队反对地方造反派的典型做法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处理，加大了对军队一些高层领导干部的打压，加重了对已倒台的若干高级将领的惩罚，并发出了“武装左派”的指示。<sup>3</sup> 一场毛泽东与军队之间全国性的、严重而紧张的关系，在当时大有可能提到文革运动的日常议程上；毛泽东与军队的关系，在文革时期第一次处在了相当严峻的关键时刻。然而，在武汉“七二零事件”结束后不到两个月，毛泽东就通过对“揪军内一小撮”口号问题及当事人的处理，特别是对王力、关锋的处置等措施，重新调整和加强了毛泽东与军队的联系。毛泽东自觉不自觉地对于军队的文革主张和文革取向做出了“倾斜”，甚至做出了不管是毛泽东情愿与否的某种“妥协”。因为，尽管毛泽东由于“七二零事件”

<sup>1</sup>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38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sup>2</sup> 关于武汉“七二零事件”的详细记述，参见徐海亮编着：《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香港，银河出版社，2005年版；徐海亮着：《武汉“七二零”事件实录》，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0年版。

<sup>3</sup>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6卷”，第577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受到了严重的刺激或影响，但是他在此事件不久之后就清醒地意识到，他必须调整与解放军的关系，特别是必须强化与军队高、中层干部的关系。一方面，毛泽东既不能离开军队对他本人的支持，也不能失去军队对于文革的支柱性作用；另一方面，他既不允许军队各级干部偏离或者游离他的文革大局的方向，也不容许军队高、中层干部在文革问题上超脱他的制约或指挥。

其次，从毛泽东接见军队干部的活动中，可以折射出毛泽东在文革最初的两三年里对于党的权力、政府权力和军队权力（简称“党权”、“政权”、“军权”）三者的不同作用 and 不同取向，特别是从这些作用和取向中所映现出的特殊内涵和特别色彩。毛泽东在文革最初的一两年，正是主要通过红卫兵学生和造反派群众，打乱了原有的中共党的权力运作机制及权威实施体制，致使全国各地的政府权力机构几乎陷于混乱甚至瘫痪，才得以把文革发动和推广开来。在这一过程中，差不多唯有解放军在整体上还相对保证完好，没有从总体上失去以往的功能和基本的职责，特别是上到军队的统帅机构下到军队的各级指挥机构大致上依然运作如旧。从社会学分析的角度来讲，文革初期的中共“党权”和“政权”处于严重的、深刻的、广泛的“失范”（又称“失常”，*anomie* 或 *anomy*）状态，而只有军队在整体上保持了“正常”状态。从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大张旗鼓地接见军队干部的做法，不难发现，毛泽东在文革最初两三年里的种种举措确切地表明了：一方面，他实际上可以把他所创建的党及其“党权”置之不顾，使这个曾在毛泽东率领下打下了新中国天下的党的各级组织工作和组织生活陷于约计三年左右的停顿或停滞；另一方面，他实际上几乎对他所主导的政府及其“政权”弃之不理，使这个曾在毛泽东领导下建设国家、管理社会的政府及其各级政权组织或机构，不是处在无法有序运作的混乱之中，就是濒临倒台、破裂和重组的危机之中。这一切的一切，都既使昔日整个中国大陆的“党—国家—社会”一体同构的文化结构和文化功能（毫无疑问，主要是政治结构和政治功能）发生了广泛、急剧而又深切的裂变，又使过去长期运行的“党权—政权—军权”这三种权力及其权威的鼎立并存的格局和传统出现了总体性的缺失甚至全局性的坍塌。也就是说，在文革初期，



毛泽东把“军权”看得高于、大于、重于“党权”和“政权”。这不仅使得“党权”和“政权”向“军权”倾斜直至屈从，而且通过“党权”和“政权”的“军权化”，毛泽东完成了文革最初不到两年的从以红卫兵学生和造反派群众为主体的第一个阶段即群众运动的阶段，向文革第二个阶段即以军人为全国各地领导权力主体的（事实上是军人为文革主干的阶段）演进或转变。

因而，这也就不难理解下面这个问题：为什么毛泽东文革时期从没有像接见红卫兵学生或者至少像接见军队干部那样大规模地、分批分期地甚至专门地接见文革时期的党政干部，最多是在接见军队干部的活动以及有关的节日典礼活动等之中，有来京参加专业或生产或经济等会议以及其他专门任务的人数相当有限的党政干部被顺便“插入”上述的活动之中。毋庸置疑，毛泽东在文革初期的三年多时间里，相比于党政干部及地方干部，他更加看重军队干部，也更加重用军队干部。

再者，从文革的历史来看，毛泽东接见军队干部意味着是使文革从上述第一个阶段转向第二个阶段的切实保证。很有意思的是，在文革最初的这两个阶段，亦即在文革初期的关键时刻或重要关头，毛泽东每每都要诉诸中共中央上层领导之外的力量。从第一次诉诸以青年学生和普通群众为主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到第二次诉诸以解放军高、中层干部为主的干部队伍，毛泽东不仅给文革注入更多更大的缘于他自己的意志和意图的因素和特色，而且也使得文革无论在全局上还是在局部上都更加必然地走向并非毛泽东本人所能左右的不归之路。毛泽东接见军队干部的活动，是与前面所述的“军人为文革主干的阶段”密切相连的。在我看来，这个阶段大致上起于1967年，兴于1968年，并于1969年至1971年达到“鼎盛”，于1972年结束。非常值得提起的是，毛泽东在1969年4月28日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讲话开始不久，就提及苏联和日本的媒体当时对中共“九大”产生的中央委员会人员构成所作的有关“军事官僚体制”、“军事官僚专政”的评论。<sup>1</sup>看来，毛泽东很在乎这种评论，并在第二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把这种“在乎”转变为对林彪势力尾大不

<sup>1</sup>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3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掉的忧虑，转变为在“九一三事件”之前通过所谓“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等一系列做法来削弱唯林彪马首是瞻的军队干部的作用，这些已是后话。无论怎样，毛泽东接见军队干部的活动，是这种在中共“九大”前后形成并运转起来的所谓“军事官僚体制”或“军事官僚专政”的有机组成部分。这里，略用数字来表示这种“军事官僚体制”或“军事官僚专政”的某些特征。从1967年2月至1969年4月，解放军每月投入“三支两军”工作的指战员都在90余万人，1968年上半年每月平均在95万多人。<sup>1</sup>截至1968年9月底，在全部成立的中国大陆29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当中，军队干部出任主任的就占有20个；在由军队干部担任县以上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北京市占78%，广东省占81%，辽宁省占84%，山西省占95%，云南省占97%，湖南省占98%，<sup>2</sup>平均下来已逾90%。到1970年底，军队依然有279万人次参加“三支两军”，其中约有4.9万人担任县以上革命委员会委员的职务。<sup>3</sup>借用流行过的一句话来形容那时的中国大陆：“七亿人民七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

因而，如果说1967年至1968年毛泽东接见军队干部是对前一年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某种“超越”，那么也恰恰在这种“超越”中，凝聚着1966年8月中共中央有关文件把文革说成“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sup>4</sup>的“大革命”的谬误、破灭和离弃！换言之，自1967年起，随着军队势力的广泛介入和全盘干预，作为“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文革，就已开始成为毛泽东的文革及其历史的一出荒唐而悲惨的怪诞剧！正如吴法宪在其回忆录中所提及的：“‘九大’以前，由于‘文革’的冲击，所有的地方政权基本上瘫痪了。毛泽东决定军队以‘三支两军’的形式，接管了各级地方政权。毛泽东靠军队稳定了全国秩序，从而使军队在国家事务中起到了一种特殊的作用。这种情况是当时客观条件造成的，当时如果没有军队的介入，很难设想国家将是一种怎样

<sup>1</sup> 邓礼峰：《“三支两军”论述》，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6期。

<sup>2</sup> 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第244页，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sup>3</sup> 同上，第241页。

<sup>4</sup>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8月8日），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二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6年版。

的情况。因此，在‘九大’中央委员会中，军队干部占了一大半，当时的政治局共二十五人，军队干部占了十四人。军队的势力越来越大，林彪个人的威望也越来越高。”<sup>1</sup> 历史地看来，基于文革的逻辑（假设文革还有逻辑的话），1971年9月林彪的灭亡乃至稍后的军队势力在文革大局中的消解，乃是文革的一种宿命！

### 三

名义上，毛泽东接见军队干部活动的对象，大多是以解放军各大总部、各大军兵种、各大军事院校、各大军区、国防科委、军事科学院、北京卫戍区等单位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等等的与会人员。例如，济南军区来京参加毛泽东接见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成员，就有两千多名团职以上的干部。这些干部中的许多人当时正在参加“三支两军”等工作，在接到参加上述学习班的通知后，他们迅即报到。这两千多名干部先在济南市的军区有关驻地集合，参加有关的学习和动员会议，重点学习和反复领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历史，进一步增强对毛泽东个人的崇拜、敬仰和爱戴之情。稍后，乘上被称为“毛主席专门派来”的原来行驶在国际列车线上的高级列车，前往北京，居住于解放军有关院校的宿舍，并在这些院校里继续进行的学习，随时待命，等候毛泽东的接见。

毛泽东接见军队干部活动的每一次举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大报以及解放军各大单位自己的有关报刊上，都会迅速地加以特别报道，并在随后的数日里连篇累牍地发表各类文章，欢呼庆祝，重点突出对于毛泽东“四个无限”（即“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信仰毛主席，无限崇拜毛主席，无限忠诚毛主席”）和“四个一切”（即“一切想着毛主席，一切服从毛主席，一切紧跟毛主席，一切为着毛主席”）等主题的报道。其他媒体部门，例如，中央新闻电影纪录片厂和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也及时地摄制相关的纪录影片，在各地广泛放映，大加宣传。而受到毛泽东接见的军队干部所在的原单位、部门或

<sup>1</sup> 吴法宪：《艰难岁月—吴法宪回忆录》第822页，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版。

机构，更是一派欢呼雀跃，忙碌不已。他们不是有组织地连夜开大会、搞游行、发贺电，就是集体性地立誓言、献锦旗、表忠心，不一而足。而在北京受到毛泽东接见的那些干部，在接见之后所举行的各种庆典、座谈会、宣誓仪式，更是热闹非凡，一浪高过一浪，令人目不暇接。这些受到毛泽东接见的干部们，回到原单位、部门或机构，还受到了留守的广大基层干部和战士的隆重欢迎。那些受到毛泽东接见后继续参加“三支两军”任务的军队干部，受到地方群众的热烈欢迎。显然，所有这些在军内和军外所营造出的氛围，都是要强化对毛泽东作为文革的最高统帅和最高领袖的绝对认可和绝对服从。因而，差不多正是在毛泽东接见军队干部期间，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活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毛泽东文革初始是借助红卫兵运动把对他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活动推广、普及开来，二是借助大规模接见军队干部进而使对他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活动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不同于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活动在广场或街道两旁等露天场地举行，毛泽东接见军队干部一般在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或首都体育馆举行，主要是这两个地方各自都可容纳一万余人。在室内进行接见活动有很大的优点：一是比较好安排，二是保密性强，三是实施起来有序有度。毛泽东接见军队干部的活动非常有特点。这类接见活动大约持续数十分钟。毛泽东一出现在主席台，接见场地就会同时响起《东方红》乐曲声。毛泽东首先步入接见会场主席台，随后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中央军委等负责人鱼贯而入。毛泽东一般在主席台上来回走动，不断鼓掌，频频向台下或周围招手致意，而受到接见的人，群情鼎沸，山呼万岁。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类接见活动中从未做过大会讲话或即兴演讲，也没有其他中央领导人做过讲话或报告。毛泽东往往在接见活动的尾声，走向主席台一侧，同来自解放军各有关单位的领导人（常常是总部、军兵种、大军区等副职以上的领导人）一一握手。毛泽东还经常在这种握手中，对某些特殊的个人表示自己的关注之情。例如，邱会作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述到，1967年9月，毛泽东在一次接见活动中，在主席台上与在身旁的干部一一握手，走到邱会作面前说：“这个是姓邱的。”“主席刚

要往前走，又退回半步，一边拉着我的手，一边指着我说：‘娃娃都有白头发了。’我当时非常激动，因为在这种场合，主席和谁多说几句话都是莫大的荣幸。我看主席这次接见军队干部，心里似乎好受多了，军队还是他的，军队干部也还是他的。”<sup>1</sup>又如，原解放军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的儿子陈人康回忆到，毛泽东于1968年2月10日在首都体育馆接见装甲兵、工程兵、炮兵、铁道兵、通信兵、防化兵六个兵种和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这几个兵种的首长也有缘见到他们崇拜的毛主席。记得那天体育馆里欢呼声、掌声、激动的哭泣声震耳欲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真情呼喊使得这个巨大的场馆一下子变得渺小。父亲感到，只要是毛主席到哪里，哪里都会变得渺小。”“父亲说，好多年轻的战士踩在座椅上狂呼乱跳。后来，几千个座椅都要修理。”走到工程兵人员所在的位置时，毛泽东见到陈士榘，眼里发出久别重逢之光，伸出手，领着陈士榘向前走了几步，让记者拍照，令陈士榘激动不已。<sup>2</sup>

在毛泽东接见军队干部的活动中，有一次是“特例”，那就是1968年3月25日凌晨，毛泽东接见在京解放军各大单位及其所属的在京部队的团职以上干部。这次接见实际上源于所谓“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问题”，而不同于以往对来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类军队干部的接见。在3月24日夜间9点30分至25日凌晨1时30分，林彪等人作了有关“杨余傅问题”的讲话之后，毛泽东于25日凌晨1时35分出场，接见在场的一万余名军队干部。这无疑是向在场的人们宣示他本人对“杨余傅问题”处理的首肯，进而更加显示出他本人的文革权威，特别是他本人对文革时期军队问题的决定权。非常有意思的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报刊对于这次接见活动，没有像以往报道毛泽东的接见活动都是在次日就加以大幅报道，而只是在第三天即3月27日才作了报道，并且也没有像以往那样标明毛泽东接见的确切时间，只是说毛泽东“最近接见了军队

<sup>1</sup> 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下册，第538页，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

<sup>2</sup> 陈人康策划、口述，金汕、陈义风着：《一生紧随毛泽东——回忆我的父亲开国上将陈士榘》，第113-1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干部”，这一点看来似乎饶有意味。

更加富有趣味的是，在几乎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大规模接见军队干部的活动中，即在1968年8月15日，毛泽东特别请来了被称之为“首都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首都工人的代表”。毛泽东让这些代表参加接见，则是出自对这些代表的安抚和慰问，即对7月27日由他决定派出的三万多任务人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而遭到清华造反派的抵抗而发生的严重的流血牺牲事件所作的一种“善后之举”。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报刊8月16日关于这次接见的报道上，都把被接见人数相对不多的这些代表列在被接见的军队人员单位名字之前，以显示出对这些代表的重视或关爱。今天看来，正是毛泽东派出了由其身边8341部队干部所领导的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才促使清华大学所发生的“七二七事件”，标志着红卫兵运动和造反派运动的破产，标志着文革第一个阶段即群众运动阶段的结束，进而也标志着军队干部真正成为文革新阶段的主干的开始或继续深入。■

（此文首次发表在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13年2月号第135期，有删节。今承作者和《二十一世纪》授权，全文发表。特此说明。）



【评论】

## 九零后观文革

——来自一个非亲历者的视角

李伟男

### 一、前言

今年清华校庆来临之际，我有幸收到了孙怒涛老师主编的《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2月第一版）一书。捧读这套142万余字、约计七十余篇回顾和反思清华文革历史的力作，作为一位“90后”的大学生，再次使我陷入对“文革”（以下简称文革，且不带引号）的反思。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这场革命定性为：“1966年5月16日至1976年10月，在中国由毛泽东错误发动和领导、被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政治运动。”<sup>1</sup>以《五一六通知》为起点，以“四人帮”被捕为结束标志。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的特定历史阶段，因其所处时代的特殊性而被单独提出。美国学者费正清将文革的时间定为“1966年5月到1969年4月”，<sup>2</sup>认为这一期间全国动乱最甚。但通常，国内研究者将文革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66年5月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第二阶段从中共九大到1973年8月中共十大，第三阶段从中共十大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捕。

十年文革，经过无数亲历者在回忆、反思中的不断刻画，逐渐清晰。文革这一概念，在“层累地构造”下，<sup>3</sup>已不再仅仅指党史话语下党内特定阶段的路线斗争，或是国史漫谈中领导层的更迭带来的国家政策的改变。它已成了一块绘满众生相的画布，一出人物谱系

<sup>1</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页366。

<sup>2</sup> 费正清著，张理京译：《美国与中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页320。

<sup>3</sup> 借鉴自顾颉刚的古史辨“层累构造理论”。

复杂的戏剧，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变迁的大舞台。这十年对于许多亲历者来说，是一场不堪回首的灾难；对研究者来说，却是独一无二的宝库。

尽管不过几十年，当年的痕迹，却早已被时代发展的浪潮冲刷殆尽。成长在改革开放中的我们，看不到在清华“二校门”的断壁残垣，看不到人手一套的“红宝书”和人人佩戴的毛像章，看不到被人群包围批斗的“牛鬼蛇神”。我们只能通过长辈的讲述或书本的描写，来遥望这段历史。这是一种不幸，也是一种幸运。不幸的是，我们对于文革的情感远不如长辈们那样深入骨髓，相对也就不会有那么强烈的历史责任感，这是我们始终欠缺且无法弥补的。幸运的是，我们受到了没有间断的、相对比较自由宽松的教育，生活在一个尚可独立思考而又不需要为之付出高额代价的时代。尽管目前还有很多禁忌没有打破，但是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文革研究尚可进行的时代。庆幸自己能够赶上文革研究这辆前行的列车，有机会一睹这沿途的风景。

## 二、“理性”与“疯狂”

官方对文革的定位，深刻地影响着学术研究和民间的反思。我们看到，一方面，官方机构出版了大量的文革史和人物传记；另一方面，独立研究成果和大量亲历者的回忆、日记、口述访谈，却因为无法通过审查而难以问世。与“正史”对史实的掩饰相对应的，是海外出版物对文革无情的谴责和揭露。而这其中，又不乏为了夺人眼球而无视真实的“揭秘”、煽情之作。在网络上，不同意识形态的论争各持一端，形成了对“文革图景”诠释的巨大差异。

在如今“谎话选择说，实话不全说”的语境下，既有的定式常常给年轻人某种刻意的误导。正如秦晖教授所言：“否定文革主要就是否定造反派，文革被描述成造反派迫害走资派的单一图景，以至于文革过去40多年后，年轻人知道的文化就是毛泽东支持的造反派

整走资派，邓小平抬举走资派肃清造反派。”<sup>1</sup>而不能摆脱用扣帽子对“造反派”、“走资派”来定性的思维惯性，去发现每个人的复杂性并找出其真实意图，便无法发现被掩藏的完整因果。又如《对一份后文革年代资料的多重解读》一文中提到的，文革后对“走资派”、“造反派”和“三种人”的定性和处理，经不起仔细推敲。<sup>2</sup>同为“造反派”却受到截然不同的对待，而这种不公正又决定了当事人后来的生活。当时，并非所有的“造反派”都被审判，也并非所有的“走资派”都得到平反。这其中的微妙，有助于我们揭开文革幕后复杂的背景。

对文革的否定不够彻底，首先表现在继承了毛时代“法统”的当今政治，对许多极为恶劣的暴力流血事件进行掩盖。如秦晖教授提到的“七三布告”引起的广西屠杀事件为代表的全国各地的大屠杀事件<sup>3</sup>，以重庆“八一五”公墓为代表的因武斗和运动引起的大规模死亡事件。对于这些的谈论，至今仍然是忌讳的，更不要说正视。对文革期间的暴力若是故意回避，又何以能够做到彻底？其次，对“左”的否定同样如此，如同秦晖教授所说，“今天几乎100%的当年右派都已平反，但反右仍被认为必要”。<sup>4</sup>再次，文革以来“非左即右”的观念至今仍然根深蒂固，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始终无法脱离根据政治立场褒贬的惯性。政治不是历史，做不到完全客观理性的评价。由于对于“左”的批判渐渐被消声，重新回到极左的老路并非不可能。

对文革中的某些合理之处不敢肯定。其一，是红卫兵时期对于前十七年“党化教育”的反抗和批判。诚然，学生自我管理带来的混乱以及大学停课、停招不足取，工宣队领导时期的工农兵学员教育更是教育的悲剧。可是，如今文革后的教育又回到了“党化教育”的老路上。单就清华而言，我们从未抛弃过“又红又专”的宗旨，教授、知识分子治学治校仍然只是一种理想。相对于五十年前，我们在教育模式上并未取得根本上的突破。“文

<sup>1</sup> 孙怒涛主编：《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2月第一版，页34。

<sup>2</sup> 同上，页1311-1355。

<sup>3</sup> 详见秦晖：《“否定”并未彻底，“真相”仍待揭示——从文革中的清华与广西谈起》；谭合成《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香港天行健出版社2010年，页34。

<sup>4</sup> 孙怒涛主编：《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2月第一版，页34。

革时期毛主张的带有‘反智主义’情怀嬗变的乌托邦主义的‘教育革命’是中国教育的不幸”<sup>1</sup>，而如今的我们又是否更为幸运。其二，文革时期的群众运动，存在太多的不合理和值得被批判的地方。但“发起”这一形式自由，是应该被肯定，还是要像如今这样被批判禁绝？就算从内容上来看，整个运动就完全不可取吗？从大量回忆和文章勾勒出的红卫兵运动图景来看，有很多并非用“狂热”和“极左”就能简单概括的细节。

### 三、“新瓶”与“新酒”

当今的文革研究，在问题选择和研究角度上过于集中。在研究对象上，相当一部分研究者倾向于锁定毛泽东、周恩来、林彪、江青等核心领导人物，如毛泽东等人真实生活的披露、领导层之间的权力斗争、“左派”与“右派”政治立场上无休止的拉锯。无论是官方、民间还是海外，对于“阴谋论”的阐释方式乐此不疲。在研究主题上，主要集中于“红卫兵”、“冤案”、“知青”、“林彪事件”等。研究问题的集中程度则更甚于前者，诸如文革的起源、谁该为文革负责、对文革的定性评价、对红卫兵运动的评价、对“四人帮”的评价等。

诚然，文革研究仍处在成长阶段，其内容在不断丰富。我们看到，这片荒原已冒出了许多充满生机的新芽。域外相对自由的环境成就了不少有突破性的研究，在史料的收集和整理上更加细致全面。电子化的文献为研究带来了便利<sup>2</sup>，一些外国学者为文革研究输入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包括政治学的理论分析、统计学的科学计算、阶层分析法、文化学、符号学、心理学等等。这些研究方法扩展了文革研究的外延，为检讨文革提供了新的强有力的工具。国内外研究中，在传统的利益群体和政治派别分析之外，开始从文学、艺术、思潮、学术的角度打开突破口。对名物考察，沿着一些不起眼的细节顺藤摸瓜，“小处着眼、大处着手”，为文革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sup>1</sup> 孙怒涛主编：《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2月第一版，页61。

<sup>2</sup> 以宋永毅等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为代表。

以对蒯大富的研究为例，单以蒯大富的口述回忆是显然不够的。《历史拒绝遗忘》收录的《回忆1966年夏周总理的亲切接见》一文<sup>1</sup>，则采用了新颖的访谈方式：将不同参与者的回忆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对重要环节的记忆矛盾之处条分缕析，进行有理有据的推测，进而参考《周恩来年谱》等档案，实现史料之间的相互印证、纠错补漏。这既是蒯大富研究过程的第一步，也是检验研究可靠与否的基础。这类文章在本书中还有很多，值得借鉴。<sup>2</sup>秦晖教授在对“7·27事件”的考察中<sup>3</sup>，结合“井冈山”和“414”成员口述，推测毛的意图，根据其他当局者如周恩来、文革小组成员的态度，并将“清华、北航黑会”作为贯穿的主线，进行全方位的分析，揭示当事人有意或无意掩盖的一面。在众多史料中抓住一直不被注意的档案记录<sup>4</sup>，见微知着，揭示出“7·27事件”前各派对蒯的态度。这种对史料的娴熟运用和高度敏感，是值得我们这些新人学习借鉴的。

当主流叙事日趋雷同、形式单一时，打破常规，质疑某些对史料的模式化分析，乃至质疑已有的史料本身，显得迫在眉睫。对文革整体或对具体人物的“全盘肯定”、“全盘否定”的单向思维应该打破。相对于其他的历史研究，对文革研究者的个人素养、学识以及勇气都有着更高的要求。不断扩展自己的视域，不断进行自我反思，是取得突破和更大成绩的关键。

研究文革，归根结底不是为了伸张正义。没有真相作为前提，任何关于伦理的讨论都毫无意义。历史学者应该还历史本来面目，将关于正义的讨论交给伦理学，将“伸张正义”的重任还给专业人士。

#### 四、历史的警钟

<sup>1</sup> 载于《历史拒绝遗忘》页91-114。

<sup>2</sup> 诸如林贤光《我和清华“红教联”》，尽力摆脱自身亲历者的反思局限，找到了大部分当事人进行材料的收集。这篇文章也是少数关于“红教联”叙述全面详细、平和有据的好文章。张从《文革中的蒯大富与聂元梓关系考》在考证事实上形式可取，相比不如林贤光在《我介入了北京的天地派之争》一文内容丰富、见解深刻。

<sup>3</sup> 秦晖《“否定”并未彻底，“真相”仍待揭示——从文革中的清华与广西谈起》中前半部分，《历史拒绝遗忘》页3-17。

<sup>4</sup> 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广西班办公室记录整理，转引自秦晖《“否定”并未彻底，“真相”仍待揭示——从文革中的清华与广西谈起》一文。

我们不仅要看到文革的全部症状，还要知道病在何处。在文革中，以阶级斗争手段去批斗异见分子，是整个社会的风气。蒯大富等一些学生不满于工作组扣帽子、打棍子的做法，而在工作组被赶走后，以蒯大富为首的井冈山兵团，又用扣帽子、打棍子的做法，对待他们的对立面。他们反对的从来不是手段本身，而只是别人用这种手段针对自己。文革期间无论哪派掌权，扣帽子、打棍子等一系列的迫害行径从未停止，造成的被逼自杀等非正常死亡的惨剧从未断绝，这非常值得我们反思。

在文革宣告结束并被“彻底否定”之后，文革的阴影并没有消失。部分在文革中揭竿而起的人，宁愿在道德上受到审判，也不愿意承认在政治上有问题。一部分参与“西纠”、打砸抢的红卫兵，拒绝站出来向当年自己伤害过的人道歉。孙怒涛老师组织编辑的《历史拒绝遗忘》一书，为当年的亲历者进行回忆和反思提供了一个窗口。“如果一个人的眼神关注的是整个群体的前途，而不只是一己的生命，那么，他的行为举止，看起来更像一个智者，而不是一个受难者。”<sup>1</sup>在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那些记录历史的受害者，身上有着“智者”的光辉。

历史的警钟要几代人共同努力才能够敲响。我们的前辈那一代人凭着对历史的责任感，做出了超越自身局限的努力。我们这一代要做的，是要让这钟声长鸣，传播得更远。

## 五、结 语

“在一个正义能够得到声张的社会里，再大的冤屈也是没有很大的杀伤力的。当事人总会存有沉冤昭雪的念想。置史明远于死地的是1949年以来，令知识分子们乃至一切有独立见解的人窒息的政治环境，那种旷日持久的阴森森的肃杀的氛围。”<sup>2</sup>高越农先生的话发人深思。

至今为止，对于文革中呈现的“理想主义”以及“为什么却那么多有理智的人自愿参

<sup>1</sup> 转引自汪涵的演讲文《不要轻视行动的力量》，<http://www.gkstk.com/article/1414370347390.html>。

<sup>2</sup> 高越农：《回忆史明远同学并寻思他自尽的原因》一文，载于《历史拒绝遗忘》页757。



与向手无寸铁的人施暴”的问题，还没有给出相对合理的解释。彻底批判者着眼于血淋淋的事实，以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理论阐释文革。而肯定者则努力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理论归于共产主义理想，继续做着假如文革没有结束的梦。

但绝大多数人的共识是，中国绝不能再来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随着经济高度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民族自信日益高涨，爱国主义热情极度膨胀。对于网络媒体呈现的群众舆论暴力，官方主流媒体采取纵容和暗中支持的态度。很多人惊呼“新时代的红卫兵出现了”，“文革重现”。事实上，如今的年轻一代，对文革的了解大多是模糊的，只有一些关于“红卫兵”、“暴力”、“语录”等符号的印象。要让文革这段历史被真实地传播给大众，任重道远。只有当文革不再是年轻人信口拈来的流行语，而是在被深刻认识后令人沉痛，文革才能够不再重演。

而学者的重任是，努力探寻文革的真相和内核，并将罪恶的根源揭示给后人。■

## 【评论】

### 张春桥和《有感》

李 逊

张维维在对父亲张春桥的回忆中说：“我父亲没有个人野心。他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做毛主席的秘书”，“所以如果华国锋要用他，他会继续帮助下去”。这个说法，和当年审判张春桥时公布的材料很不一样。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中说，1976年毛泽东决定启用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张春桥非常不满，2月3日，中央公布华国锋任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通知的第二天，张春桥写下了《有感》。当年对张春桥的声讨，将张春桥的这个《有感》，解读为对自己没能当上国家总理的“怨恨、沮丧、报复的情绪”，当然，也解读为对华国锋的不满。

因张春桥家书出版，张春桥又成为热门话题。有文章说，毛泽东最后一个重要决定，是明确了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张春桥对此大为光火，当天写日记发牢骚，还抄了王安石

的一首诗。作者的资料和对资料的解读，显然盖源于上述文件。

事情要溯源至1975年。王洪文喜欢吃喝，而请王洪文吃喝最多的是叶剑英，有时半夜都会打电话把他叫去。1975年中国新年的大年夜，叶剑英又将王洪文请去西山，吃年夜饭。叶剑英打招呼说：“我今天身体不好不来了，请一些老将军们代我作陪”。叶剑英吩咐作陪的老将军们一定要让王副主席喝得尽兴，使他高兴。于是，席间众人轮流向王洪文敬酒，非要灌醉王洪文，有人甚至起哄，往王洪文身上泼洒茅台酒。同去的萧木看到高层这样的吃喝排场，心里非常难受。

萧木原是上海市委写作组核心成员，曾担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和常委们学习马列著作的辅导员，王洪文在上海市委工作时，也一起参加学习。1973年5月萧木奉调北京，参加筹备中的中共十大党章修改工作。十大闭幕，王洪文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将萧木留下当自己的学习辅导员。王洪文对萧木很尊重，称呼他时，都叫“萧老师”。

萧木一直不愿意跟随王洪文吃喝，许多宴席都被他推托。这次因为是大年夜，王洪文一定要他也去，不得不去。看着泼洒茅台酒的哄闹场面，萧木难受得掉下眼泪。而在之前，王洪文的秘书米士奇以及几位工作人员，多次希望同样也从上海来的萧木，能以老师的身份劝说王洪文，不要这样沉湎吃喝。年夜饭结束后，萧木与王洪文谈话，整整谈了三个小时。王洪文听着，最后说：有的情况你不大了解。我有我的难处，上面这些老家伙根本不承认和不支持党的十大路线。只有叶帅还是支持我的，叶帅叫我来，我不能不来。王洪文这是指十大召开之前毛泽东欲立王洪文为副主席，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反对，叶剑英站出来批评了许世友之事。

谈话结束后，王洪文派了辆车，将萧木从西山送至住地钓鱼台。车子沿着透迤的道路下山。正是大年夜，沿途彩灯连绵、炮竹声不断。但萧木的心情却极差，一路眼泪不断。为什么，他自己也说不清。

回到住址，萧木就给张春桥写了封长信，倾诉刚才的情况和自己的心情。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最看不得浪费和特权。现在新中国建立快25年，文革进行快9年，这样的状况怎么还没得到根除。萧木所以给张春桥写这封信，是因为张春桥在他心目中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提倡者，尤其他觉得张春桥自身清廉简朴，在生活方面严以律己。信的最后，萧木落款“在炮竹声中”，以示写信时间在大年夜。第二天，年初一，张春桥的回信就到了。

也是一封长信。大意是，现实确实是这样，但你不要悲观，再过25年，肯定不会这样，肯定会更好。信的落款是“也在炮竹声中”，回应萧木的落款。

第二年，1976年的春节，张春桥又给萧木一封信，就是上文提及的《有感》：

又是一个一号文件。

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

真是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

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什么新“时代”了。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

人民是决定的因素。

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站在先进分子一边，就是胜利。反之，必然失败。

正是：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1976年2月3日有感

这封给萧木的信，后面的落款是“又在炮竹声中”。不过审判张春桥时，法庭出示的从张春桥办公室搜出的证据上，没有这几个字，有标题《有感》。给萧木的那份没有《有感》的标题。估计可能是张春桥留给自己的底稿，没写“又在炮竹声中”。

从萧木1975年给张春桥的信，到张春桥1975年和1976年给萧木的回信。可以看出，张春桥那封信中所说“又是一个一号文件”，不是对着华国锋，而是对着邓小平。因为1975年一号文件，是关于邓小平复出的，而1976年一号文件，任命华国锋为总理，实际罢黜了邓小平的权力，所以张春桥才会在信中说“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张春桥这是针对萧木去年给他的那封信中的消极情绪，要萧木看到：华国锋这个新桃换下了邓小平那个旧符，你看现在形势不是很好吗？萧木当时读着张春桥这封信时，也这样理解。

文革结束，萧木受审查。专案组一定要他交代张春桥1976年春节给他的那张“有感”纸条，是张春桥自己想当总理没当上，发泄对华国锋被任命为代总理的不满。还要萧木交代张春桥是否有其它反对华国锋的言行。萧木如实交代，说张春桥那张纸条的来由，是因

自己1975年春节给张春桥写的信。萧木还交代，毛泽东逝世后，上海徐景贤赴京参加守灵，他听见张春桥对徐景贤说：你回去告诉老马（张春桥不称马天水为“马老”），今年国家有一亿多财政赤字，请老马告诉上海工人再努把力，多作贡献，争取把这一亿多赤字抹去。萧木认为，这是张春桥要求马天水支持华国锋的工作，帮助华国锋和国家度难关。要支持华国锋的话，张春桥对他萧木也曾说过。

这样的交代显然无法过关，萧木被反复审问。不管他承认不承认，张春桥的这张纸条终被定为对华国锋被任命代总理的不满发泄的证据。虽然历史可能确如张维维所说，张春桥当时并没有反对华国锋。

上海有句俗话“硬装樨头”，有时候我们以为是真相的历史，却可能是被硬装的樨头。张春桥也曾给许多人硬装过“樨头”，例如陈丕显的“黑小鬼”，例如曹荻秋的“叛徒”，等等。当在法庭上听着对他反华国锋的指控时，不知张春桥有没有想到自己文革中做的那许多樨头。■

（资料来源：2015年与萧木的闲聊）

【要有光】

嫂子问：“你怎么才来？”就咽下最后一口气。（胡杰插图）



【要有光】

## 寻找逃荒的妇女娃娃

——李桂兰、刘玉芬、刘慧霞、牛玉凤访谈

依 娃

### 媳妇饿死了她的婆婆

受访人：李桂兰。女，77岁，陕西省户县涝店镇里贤村人。逃荒前为甘肃省武都县人。

时间：2013年9月8日。

录音长度：30分钟。

采访地点：陕西省户县涝店镇里贤村人李桂兰家。

依：姨，你是哪里人？

李：武都城是个城，属于天水管。天水是专区，武山、洛门、甘谷解放以前是三个县过去就是三寨河，过去就是鸳鸯镇子。鸳鸯镇是个重点，过去就是陇西县。

依：你多大岁数了？

李：我七十七了。我身体也不行，有高血压，干活也干不动。

依：你们那时候情况怎么样？

李：解放以前也不好，我听大人说人家拉壮丁哩。我爸身体也不好，把我爸半腰一抱，进来几个人把你五花大绑一绑，一绑就拉走了。为啥我爷爷每年要雇壮丁，年年雇壮丁花钱，年年雇壮丁花钱，兄弟几个没有人愿意当兵……不好，我们是蔬菜区，务菜哩，把菜卖了，给你一点钱，你再去买面。五八年大炼钢铁，修公路，我去给人家大炼钢铁，在峪河滩。我刚去，还不会干，端上一盆子沙子，穿着雨鞋，在里面涮，一直涮，一直涮，剩



下最后一点点就是铁。到天黑了，那个盆子就装满了。我那时候梳着两个长辫子，都掉到勾蛋上。（土语：意思是两条辫子垂在屁股上）

依：去炼钢能不能吃上？

李：吃在大灶上嘛，在人家的部子里睡，白天在河里面涮铁。爷！大跃进，你干农活都是抽空做，让你去修公路，唱的那个歌是：“大跃进呀嘛呼嗨！大生产呀嘛呼嗨！啼哩哩，哗啦啦……”哈，哈哈哈，唱的解放军的歌。

依：你们是什么成分？

李：我们是贫农，把那些地主富农收拾得厉害，把东西都没收了，把人全部撵出来，把门一封，不让你进去住。我家是雇农，要啥没有啥，是最穷的，贫农雇农，可怜得很。文化大革命还派人去那里调查，人家说是雇农，没有问题。

依：后来就没有粮食吃了么？

李：队长就把粮食装在库里面，不给人吃。饿得没有办法了，人就去给人家队长下话（土语：求人说好话），给上几斤。粮食在仓库里，队长不随便给人，把人饿死了，饿死的人多得很！那是几十年才遭一回的大年景，人吃那个榆树叶子，吃的只拉屎，拉得停不住，吃那个甜菜根晒干磨成面熬汤喝，一天就吃那个饭。老人娃就受不了，把肠子饿得薄薄的了，再一吃就把肠子撑烂了。我家里没有饿死人，村子里饿死了几个哩。人吃人，狗吃狗，老鸦吃石头。那是大年景！东庄子人不敢到西庄子去，西庄子人不敢到东庄去嘛，就害怕半路上让人给杀了刷上人肉了。去了就把你杀了，你把你杀着吃了，人吃人哩。这是大年景！自己的娃娃饿死了，自己人埋了，有些人又去掏出来，就煮着吃了。有的人要去饭，晚上随便歇息在烂房子里，人家就把他杀了。人家支的床板，下面垫着灰，就一杀，吃了，头发还积攒了在笼里。

依：人没有了，政府不找吗？

李：政府？政府也没有办法管，管不过来了。被杀掉的人，人家就埋了，过了几年还给他家儿子媳妇托梦哩，说：“人家把我剁成块块子吃了，又把我给埋了。”他家里人去

找把人挖出来，都是碎骨头，剁开的碎骨头。

依：剁人的人不法办？

李：看你说的！几百年了，从坟墓里面挖出来的，法办谁去？在半山上哩，那是六一年的事情。那时候有一张蓆子卷住就算好的了。麦子都成了红的了，就是不给人吃！红的了就是坏了，发霉了，成红颜色了了。麦子坏了。我爸去那个部子一家，在我三爸部子里，日子过得好得很。把他妈和他兄弟领过去，那个女人给他妈这么做饭！一个锅里做两样饭，一边是浆水菜放一点点面，菜多面少，煮一下就熟了，让他妈吃那个。他家吃的菜少面多，她和男人吃。做饭是一个锅吃两样子饭。两口子吃馍，他妈看着，坐在案板边上不准她拿。给他妈说：“你吃不成，这里没有你的粮！”先把他爸饿死了，后来把他妈也饿死了。他妈还没有死的时候，就爬到房顶上，咱那里的房子都是石头修建的。她爬上去喊叫：“村里人都听着，我把人家的面呀米呀都吃了，大家都听着，我都吃了。”就坐在房顶上喊叫，喊叫了三四声，就从房顶上跳下来，落在一堆粪土上，把腿摔断了。

依：这个老婆子为什么跳？

李：是媳妇不爱他妈，不给他妈吃，没有吃的，就饿老婆子，老婆子就饿死了。我妈去看了几次，给她饭，她不吃，给她端水，她不喝。七天不吃不喝，让媳妇欺负的咽不下去饭，就只是“呼——！呼——！”等死的时候，两件衣裳用手指头扣得烂烂的了。不吃不喝不会说话了，就是让那个媳妇害死了，就是那么个下场。最后挖了个坑就埋了。唉——！遭遇了年景了，他们家有粮食着哩，过得好。有肉有酒有面啥都有，给外人说，就说给他妈啥都吃。人家男人是个手艺人，人家积攒下着粮食，结果还舍不得给她婆婆吃，硬是把老人饿死了。

依：你家情况怎么样？

李：不好，咱不认识字，农民嘛，受罪哩。我是老大，家里呆不住，吃不上。

依：你是哪一年来陕西的？

李：五八年！五八年的八月来的。

依：是你自己跑？还是别人领你来的？

李：这里去了人把我领过来的，不是人贩子，是这里人去做生意的人，落户在咱那里了，说给我的老汉（土语：丈夫）问个亲事，就让我过来。

依：来时候你多大了？

李：我也就是个二十岁的样子。

依：你来你爸你妈同意你来吗？

李：我爸我妈不愿意，那个来领我的人说：“你妈不愿意，咱就把这事情退了，你就在家里，不去陕西了。”陕西这边的人又传话：“咱都是说好的，你去了能回来，坐车便宜得很，坐一天车就到家里了。”人家这么一说，我又跟上过来了。

依：你就敢跟上人家来？你不害怕？

李：人家把我送过来，带过来。我在武都还有一个娃，我又回去看了娃几回。以后娃大了，我来以后又生了一个男娃一个女娃。我甘肃那个儿子的儿子都有孙子了，我都有重孙子了。重孙子。

依：你来陕西以后生活怎么样？

李：我来了，没有户口，没有口粮。咱山区人不会纺线，不会织布，我就先借了一个单子卖了，到北山里换粮食拿回来吃。我再给人家做啥活还上，人家就准我吃饭。我们兄弟五个，老大家的婆娘不会织布，我大（公公）把粮食换回来就不让她吃，她有三四个娃哩，不让他们一家子吃饭。我大坐个板凳在锅灶前，对几个娃娃说：“你不准拿馍，你不能吃。这里没有你家的粮，你吃不成。”等我阿公到地里干活去了，就偷着赶紧吃。就是我男人的大家娃把他大叫爷哩，他还不给娃吃饭。生活紧张，他就说：“别的女人织布哩，你咋不织布？你吃啥？”咱这里的人也没有吃的，把衣服、布都拿到北山里换些粮食，换些杂粮回来度荒苞谷、豆子。

依：那些娃娃偷着吃吗？

李：等我阿公不在家的生活，大媳妇赶紧和一块面，火一烧烙一个大饼子，锁在柜子

里头，哈哈，他们娘们几个半夜偷偷吃，不让他爷看着。我们这个村子有个女人，自己烙一个饼子，从窗户里扔到炕上，放进自己房子，谁都看不见，自己一个人偷着吃。我老家武都可怜，人没有吃的，我来了下地干活，想给老家寄去点粮票。我们这里媳妇子多，人家不准我寄，我老汉就偷着寄，寄粮票还要寄去全国统一粮票。陕西粮票到甘肃还用不成，我去换全国粮票，还要给人家提上二斤油。没有这两斤油，人家就不给你换。一个农民家庭一年吃不上二斤油！

依：你来给你分地吗？

李：地不给分，就照顾一点粮食，还有点红薯吃。咱甘肃饿死的人多，陕西很少听说饿死的人。那一年甘肃来人查人口，又让我回去，我回去办户口，要一百多里路哩，坐车去办户口。跑了几次才办好。我老汉是复员军人，当过解放军，还照顾些。没有赶我回去，没有户口就让回去。我早就有户口了。

依：你有几个娃？

李：一个男娃，一个女娃，我来都五十五年了。等秋收了，我让我的大孙子再带我回去一次，就这最后一次了，我再不回去了。我回娘家在西安坐车，高速三路，钻好多个洞子，到天亮就到甘肃了。到月牙下车就是汽车站，我下车搭汽车，加夜班。下了汽车我往上走，坐去炭城去的车，去炭城的车路过我家，有个白门江河。下了车，我走过桥就到家了。

后记：老伴去世了，李桂兰一个人住在破旧的老屋。破锅烂灶的，苍蝇蚊子乱飞……是她害怕媳妇吗？不愿意和儿孙生活在一起吗？因为来了几个逃荒姐妹，我不好多问老人她在甘肃的婚姻、丈夫、儿子的详细情况。人说话声音宏亮，性格倔强，对几个逃荒姐妹说话毫不客气，也不愿意让我给照张相。她快八十岁了，说还想回去看最后一次，是想看看当年留在甘肃的儿子和她的孙子吗？看看自己离别五十多年的老家吗？

## 女娃送人了，男娃没人要

受访人：刘玉芳，女，79岁，陕西省户县县城人。逃荒前为甘肃省漳县盐井公社人。

时间：2013年9月8日。

录音长度：27分钟。

采访地点：陕西省户县县城刘玉芳家。

大饥荒饿亡者：

刘玉芳的丈夫，27岁，甘肃省漳县盐井公社人，饿亡。

刘玉芳的父亲，50多岁，甘肃省漳县盐井公社人，饿亡。

依：姨，你叫什么名字？

刘：我的名字改了，到这里叫个刘玉芳，以前的名字我都忘记了。我都快八十了。

依：你老家在哪里？

刘：我是漳县人，天水地区。就是盐井公社，五八年、六零年，遭灾了，那里饿死的人最多了。

依：你那时候去大炼钢铁过没有？

刘：我有娃哩，去不了，我在猪场养猪。吃大食堂吃了几天，就是稀汤汤，后来稀汤也没有了。

依：人家到你家搜粮食吗？

刘：搜哩，来搜了几次呢。过几天搜一次，过几天搜一次，满家里屋里搜。那是拿个棍子敲墙捣坑，爷，一点粮食藏在炕里，人家能搜出来，藏到草房子里人家也搜出来了。你埋到厕所的茅坑里，人家也搜出来了。你看，那些人厉害吗？到处都能搜出来。

依：那时候打人吗？

刘：打哩！爷！有时候是那个干部打人。有时候是你把那个面藏到哪里，人家搜出来，

就把你拉到哪里开大会打，干部也打，群众也打，把那个人打得可怜得很。把人打倒了，拉起来，再打。谁都不敢说话，一说话，人家就说是反革命。就打，就打。

依：有没有打死的？

刘：就打死了，打得不得动弹了，回去了，就不得活了。有些人受不了，就上吊了，吊死了。

依：你来陕西多少年了？

刘：哎哟，我的女子是在这里生下的，都五十多岁了，你想一想。

依：五八年、六零年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

刘：那，那可怜得很，遭了灾了。没有吃的，人挖那个草根吃，冬天，那里什么都没有，就挖那个野草根吃。

依：你吃过榆树皮、包谷芯吗？

刘：爷呀，那还是好东西。还吃那个荞麦皮，苦的，苦得很，苦得很，把人能闹死！没有吃的，胡吃哩。榆树皮还是最好的东西。不闹人也不苦。荞麦皮子苦得很，人饿得受不了，就先填肚子。把人都饿死完了，一个队上几家子几家子人都死完了，没有人给埋，在炕上放几天，最后队长干部让人去埋。哪还有啥埋的，就是挖个坑就埋了，还有个啥？挖坑都没有人挖，人挖不动嘛。你不知道，你是这里生下的。可怜的很。

依：你在村里看见过死人吗？

刘：能嘛！都是一个队上的，咋能看不见哩？都认识。大队里公社里都死人，我们漳县一个县饿死的人多得很。

依：你在哪里看见的死人？

刘：炕上嘛，咋能看不见？睡在家里就不得动弹了，躺几天就死了。人家队上干部吃饱着哩，人家有吃的，人家贪污哩。光是农民没有吃的，群众没有吃的。

依：你们家谁饿死了？

刘：把娃他爸（注：刘的丈夫）饿死了，把我爸也饿死了。我家两个人饿死了，我那



时候有三个娃哩，没有办法呀。

依：娃他爸多大岁数了？

刘：才二十几岁，他比我还小一岁。我二十八那年，他二十七岁了，可怜的很。家里一颗粮食都没有，国家也不供应。

依：娃他爷多大岁数？

刘：我大，娃他爷也有五十多岁了，就饿死了。

依：你在漳县三个娃？

刘：嗯，三个娃。我没有办法了，一个女娃，两个男娃子。不得活了。

依：你敢不敢偷上些粮食吃？

刘：不敢，不敢。那个时候，狼也多得很，狼吃人多得很，成那个样子了。爷，害怕的很，那是年景。狼吃娃的多得很。

依：有没有人抢着吃？

刘：有哩，盐井那个街道上，看人手里有个菜馍，一把就抢走了。和饿狼一样的，饿疯了。没有人打人，都饿得打不动人了，抢了就抢了。

依：那最后国家有没有救济粮来？

刘：没有。老早国家就不救济，不管。死了病了没有人管。

依：你自己来的？还是别人领你来的？

刘：我们一起来了四五个人，我娃多，领不了。我有个兄弟，把我们领过来，把三个娃都领上。娃走不动路，我一个人领不了。你不知道，漳县去陇西坐火车，要走八十多里路哩，那时候没有汽车，全凭两条腿走哩，你说小娃娃怎么走？没有汽车，娃才五六岁，七八岁。那可怜得很。

依：你从漳县走到陇西走了几天？

刘：走了两天。我背了一个娃，我兄弟背了一个娃，一个大的娃娃自己走着。晚上就歇息在人家村子里，草房子里。第二天再走。

依：那你们路上吃什么？

刘：吃什么？没有吃的，饿了歇息一下再走，没有吃的。人家有男人的，走远路去贩面贩杂粮，咱没有人，男人饿死了。一个女人家领着三个娃娃，咋办哩？我兄弟就领我来了。那时候我兄弟还小，才十几岁。现在六十多岁了。

依：那路上查得严格吗？

刘：查得紧张得很，你能跑就跑了，跑不了就把你送回去了。人家不叫人过来陕西，甘肃不让走，人家陕西也不要。在火车上给娃买了个馍，坐一晚上就到了。

依：你领上三个娃怎么落脚到这里呢？

刘：一个老乡领来的，介绍过来的。

依：这里的伯（注：刘后代的丈夫）比你大多少？

刘：比我大几岁，没有娃，他是以前结过婚，离婚了，没有留下娃。

依：他愿意养活你的三个娃娃吗？

刘：他没有娃，如果他有娃，就过活不到一起了。他姓王，我姓刘，两家合成一家子。到这里还吃的大灶，一顿一个人一勺子饭，爷！

依：你来的时候多大了？

刘：我来的时候二十八岁了。到这里又生了两个娃，一个男娃，一个女娃。我领我的女娃来，没有户口，养活不了，就把我的女娃给人了。

依：你的女娃来的时候多大了？

刘：来的时候五岁多了。

依：哎哟，娃叫个啥？

李：来了，没有户口，娃小，吃不上，可怜得很，给了人家，让哄肚子去。娃给了人就再没有见过面，长大了才找到见了面。她结婚了，才来找我这个妈，才来看我，二十多年没有见过面。

依：你为啥给女娃，不给男娃，是不是舍不得男娃？

刘：男娃大，人家没有人要，人家不要。

依：不是你不给给人男娃？

刘：不是，是男娃大了，人家养活了，怕留不住心，怕娃跑了。人家不要男娃。

依：有一阵让甘肃妇女回去，有没有让你回去？

刘：让我回去了，我这里都有娃了，我又跑回来了。有娃，放不下，我又回来了。

依：你知道为啥没有吃的？

刘：给人家还外债，一下子把粮食还了外债了，有粮食哩，就是还了外债了。国家还了外债了。

依：现在和谁生活在一起？

刘：我的老汉都走了七八年了，我和小儿子过，那两个儿子分开自己过着哩。

依：你给娃娃说这些事情吗？

刘：娃都知道。我两个娃娃都回去过漳县，去了就住在我二爸、四爸家里。我现在十几年都没有回去了，山区地方，不知道他们的电话。

## 人贩子把我贩来的

受访人：刘慧霞，女，81岁，陕西省武功县铺邑乡大堡村人。逃荒前为甘肃省武山县人。

时间：2013年9月10日。

录音长度：23分钟。

采访地点：陕西省武功县铺邑乡大堡村刘慧霞家。

前记：介绍人带领我来到刘慧霞家，房刘慧霞子破旧，炕上也很不干净。老人面色黑红，背驼得厉害。

依：你叫什么名字？

刘：我没有名字，一个老婆子谁叫我哩？我没有名字，我不认识字。

依：你多大岁数了？

刘：八十一了，我耳朵不背，就是眼睛看不见了。

依：你老家在哪里？

刘：在甘肃的陇西。甘肃那几个县不好，甘谷县、武山县、陇西县都不好，是天水的。

依：你家里当时是什么成分？

刘：富农，人家到家里胡搜。把我们的门还封了，撵出去不让住。门封了几天，让村里人讨论，讨论了几天的，又打开了。村子人说：“这是一家好人，没有剥削人。”把我们家的两个金碗拿去了，金子做的碗，值钱得很。

依：在陇西的时候生活怎么样？

刘：那时候是没有吃的。吃树叶、树皮，哎呀，人难受得很呀。农业社只给一点点炒面，拿回去，搅和些野菜、苜蓿就吃上了。我在食堂给人家做饭，做这样那样，还变化样子。我铲下来些锅巴巴也就吃饱了，我没有受饿。

依：你给农业社干活吗？

刘：干嘛，啥都干，咱是穷命鬼。

依：你们哪里有没有饿死的人？

刘：有，有，有的人肚子饿，胡乱找东西吃，吃了拉肚子，把人就拉死了。病了，饿了胡吃，胡拉，人就不行了，成软的了，就死了。小娃也死得多。

依：你是哪一年来的？

刘：我是五八年来的。是人贩子把我贩来的，是人贩子把我领到这里的，

依：你来的时候多大了？

刘：还不到三十。我来的年成多了。那时候还不到三十岁哩。

依：你走，你家里让你走吗？

刘：家里没有人……。我娘家，但是离得远。我娘家在武山。

依：你在那里成家了吗？

刘：没有，没有。（注：按老人的年纪和当地农村的习惯，老人当时应该是成了家的妇女，但是出于某些原因，老人一口否认）那里是弟兄三个人，还没有分家，我走了，就成了弟兄两个人了。

依：人贩子领你，你认识吗？

刘：认得，人贩子说：“下面好的很，跟上我转一转去，看一看，我回来的时候就把你领回来。”人家是哄我哩，就把我领来了。我来了就是上了当了，上了当了。

依：领你的是男人还是女人？多大岁数了？

刘：男的，可能有个五十几岁了。

依：那男人叫什么？

刘：哎呀！不记得了。我认识那个人，在我们一个村子里，当过兵，见过世面的人，现在已经死了。

依：他一次领了几个人？

刘：他领过的人多得很，和我一起领来五个人。

依：都是女子娃（注：未婚的姑娘）？

刘：有婆娘，有女子，没有小娃娃。

依：婆娘在老家有男人能领吗？

刘：有男人，没有娃，没有吃的，就领上出来了。

依：你路上有行李吗？包包？

刘：没有，没有拿个啥，是人家哄来的。我哥哥都不知道我出来，人哄过来的。

依：你路上吃吗？

刘：我拿了些炒面，就吃炒面。

依：人家把你怎么安顿下来了？

刘：让我到这一家子，跟这个男人。这个男人家里有两娃，以前婆娘留下的娃。他的婆娘死了，没有人管娃，就要重给他找个婆娘。

依：他比你大多少岁？

刘：这个老汉比我大十几岁哩。人家人贩子领到这个屋里的，人家早说好的。

依：那人贩子能挣点钱吗？

刘：可能也挣不上些钱，就是一个人换一斗大麦。一斗就是个三十斤。

依：那人家放你在这里，你愿意呆吗？

刘：我不愿意，我还跑回去一次。

依：你跑，你有娃了吗？

刘：我生了一个男娃，我不愿意在这里呆，就领着娃娃跑回去了。这里我的阿公（土语：公公，）人能得很，找我去了，找到把我的娃背回来了。他把我的娃背走了，我还在陇西弄啥哩？娃的爷爷找我去了，我的阿公，老人心疼娃，想娃了，就跑去把娃背回来了。我呆不住了，没有办法了，就回来了。

依：你阿公有没有给你说好话？

刘：说好话，求我哩，就说：“咱回去，好好过日子，好好养活咱的娃。”

依：你为什么跑？都有了家了？

刘：唉……！我带走一个娃，这里他还有两个娃，也难弄得很，我不想回来。这里人说话我也听不懂。

依：那这个伯对你好吗？

刘：老汉好着哩……我还有一次跑到铺基站上，要上火车哩，来了三四个人，就把我往回抬，这里我的老汉把娃娃抢过去，骂我：“你回去，你回去，把娃给我留下，我的娃。你回去！”我第二次又跑，没有跑脱。我先后跑了几次哩。到半路上人家就把我拦住了，说：“你滚，你滚，别想带走我的娃。”带不上我的娃，我不跑。

依：你为啥要跑？有老汉有娃了？

刘：我不爱这个地方，不想在这里。人家哄上来的，哄了一辈子。

依：他打你吗？

刘：不打，我跑了，他就再见不上了。哈，哈哈。

依：有一阵让甘肃妇女回去，那你呢？

刘：人家让回去，但我把手续办来了，给我开了个证明。户口来了，就不回去了。那阵子把那些妇女集中起来，往回去送。送回去了几个，自己又跑回来，在这里有娃了。没有送我回去。后来给我分了地，我有手续。

依：你们一起来了五个人，别的人怎么样了？

刘：有些在别的地方，这个村里有两个，都死了。这么多年了。

依：最后那个人贩子怎么样了？

刘：哎呀！人贩子把多少人都贩过来了，哎呀，等他再回去，让村子里的人打得头破了，血到处流，腿都打瘸了。

依：谁打谁哩？是干部打吗？

刘：不是干部，是人贩子把谁家的婆娘领到陕西卖了，谁家就打人贩子。男人又来不了陕西，也不知道女人跑到哪里去了，就打这个人贩子。最后把那个人贩子给打死了，把人贩子给打死了。

依：打死人不受法吗？

刘：不，他把甘肃的人领完了，人家都没有婆娘了，打死就打死了，没有人上报。人贩子也没有挣下钱，一个婆娘三十斤大麦。

依：那你说人贩子犯法吗？

刘：犯啥法？反正都死了。不算犯法。

依：他贩卖人不犯法？

刘：等公家知道，人都打死了。把人家婆娘给卖了，还不打死他？他贩卖人公家怎么

知道呢？

依：你老汉哪一年去世的？

刘：哎呀，十来年了。现在就是我娃养活着我哩。

依：你再回去过没有？

刘：回去过，今年过年还过去了，女子女婿都一起回去看了看。坐火车，来的时候坐火车，回去还是坐火车。陇西站上下车，就到家了。唉——！

后记：这个老婆婆不肯说出自己的名字，她是乡下的神婆，能掐会算，说我是来“调查”的，是问她的话，虽然她不懂得写作。我心里暗暗说：“上帝让我干的事情，她看见了。”过后打听她的名字，才知道她叫刘慧霞，在甘肃陇西结过婚，夫妻感情尚好，但是遭婆家虐待，不给吃饭，才跟上人贩子跑出来。过后，我很后悔，如果能陪伴老人睡一个晚上就好了，她就会说得更多更细致。

### 嫂子问你怎么才来？

受访人：牛玉凤，女，75岁，陕西省户县庞光镇兰正村人。逃荒前为甘肃省甘谷县安原乡候川沟村人。

时间：2013年9月14日。

录影长度：32分钟。

大饥荒饿亡者：

牛润斗，男，40多岁，甘肃省甘谷县安原牛玉凤乡候川沟村人，饿亡。

董凡俊，女，21岁，甘肃省甘谷县安原乡候川沟村人，饿亡。

牛××，女，3岁，甘肃省甘谷县安原乡候川沟村人，饿亡。

牛玉凤的女儿，5岁，甘肃省甘谷县安原乡候川沟村人，饿亡。



前记：9月，陕西农村正是收苞谷的时候，每个村子的路都晒着黄澄澄的苞谷，路很不好走。好不容易找到牛玉凤家，她正在炕上睡午觉。我说：“我妈也是甘肃逃荒过来的，我来看看逃荒过来的老姨。”老人说：“好得很，上炕来。”我就脱了鞋子，盘腿坐在炕上，面对面和老人交谈起来。没有想到，老人很健谈，声音宏亮，竹筒倒豆子般的说起过去的事情。

依：姨，你多大岁数了？

牛：我？七十五，我这个老汉比我大五岁，八十了。

依：你来陕西的时候多大了？

牛：我二十三四的样子。我是六一年来的，那来得人多，庞光阵镇来的人多。

依：你老家是甘肃哪个县？

牛：甘谷县。甘谷县安原乡，侯川沟村。现在好着哩……那阵子，可怜得很，我们姓牛，我叫个牛玉凤。我们那里有个上庄，有个下庄，我们就在上庄。就是为了混嘴过来的。

依：那时候正吃食堂吗？

牛：那年正吃食堂，哎呀，我还在食堂给人家烧汤着哩。到最后就散伙了，没有吃的了。没有东西做了，锅里没有啥下了。

依：那粮食呢？

牛：不知道，那时候就是那么个情况嘛。不在食堂吃还不行，自己吃还不行，我的爷，由不了你。砸门敲窗，翻箱倒柜，屋里一颗粮食都没有了，都收走了。地里的粮食都坏在地里了，烂在地里了，社员不敢往家里拿一点点。大炼钢铁，人拉人背，牲口拉，这是大脚的女人。脚小的女人，洋芋、谷子烂在地里，眼看着拿不回来，那是山区，脚小的走不动。路不好走，洋芋都冻坏了，都流开水了。还是不准拿回来一个。唉——！那个政策坏得很，甘肃那几年政策坏得很，我一辈子就不爱甘肃。

依：那食堂停了以后，怎么办？

牛：那就是自讨苦吃嘛，人家生产队给一点粮食，有面子的人家多给一点，没有面子的就给的少一点。一天给上个一两、二两，那不把人饿死完了。我娘家的村子小，我记得有一百七十个人，我来的那年七月，来人检查人口，只留下七十多个人了。连死带跑，就剩下七十多个人了。我娘家是甘谷县安原乡侯川沟大队。死的人不少。

依：人家干部也不给一点？

牛：不，不给，和土匪一样。

依：你们自己家有饿死的人吗？

牛：我们自己家，我看，有四个人都饿死了，我大、我嫂子，我嫂子的娃。

依：你大（土语：父亲）叫个什么名字？

牛：我大叫个牛润斗，小名我还不知道，咱年纪小。才四十多岁。牛润斗。

依：你大去世，你在身边吗？

牛：我在，我大是饿死了，饿死了，人睡在炕上，吃不上。就睡着，等着死，也不叫唤。解放以前，我大是学校的教书先生，是个长才居士，人封建得很，思想落后得很，从小到大都是念佛的人，善良得很，不偷人，不抢人。我大以前教的是私塾，解放以后，没有好事。就把一个大庙给拆了，附近的人都是到那里上庙念经。我大都是忌口念佛的人，不让你信佛还不说，把我大抓起来。最后把那个庙改了，改成学校了，让我大去教书，我大思想上通不过。那时候，一个月给我大二十块钱，我大心里还是不愿意，最后就不去学校了，不干了……。人家说我爸是迷信头子，封建迷信，不来庙里给娃们上课，就批评我爸。后来遭了个年景，那一年我嫂子也死了，我大就压力大得很。

依：你嫂子才多大吗？

牛：我嫂子才二十一，娃才三岁，她十九上生的娃。我嫂子是五九年，还年纪轻轻的就死了。我嫂叫个董凡俊，和我哥两口子关系好得很。

依：你嫂子是得病了吗？

牛：你不知道，那几天到哪里修水渠，就是洮河，水渠大得很。队上叫人去哩，我哥有病，不能去，就让我嫂子去顶替去。那个叫白岭渠，修河去，让我嫂子修河去。我嫂子去了半个月，拉肚子，人饿的，脸肿得多大。那阵子男女都叫去，我哥身体不好，去不了。我嫂子拉肚子，人干不成活了，人家水渠上的干部说：“那你做不成了，你回去。”她走到甘谷车站，走不动了，让人回来带话，让我哥去接。我哥第二天去了，借了一个推车，看见我嫂子睡在人家的房檐下面，人家那家人不敢让进门，说人瘦得不像样子了。那人说：“死在我家怎么办？”“就给她铺了个烂旧毡，让我嫂子在房檐下睡了一个晚上。我哥去总算见了一面。我嫂子说：“你，你怎么这么长时间都不来接我？”又问了一句：“屋里妈和娃好着没有？”就问这么两句，我嫂子和我妈关系好得很。我哥说：“好着哩，妈和娃都好着哩。我把你扶起来，咱回家，回家。”我哥哥把她一扶，刚扶起来，“当！”一下子给摔下去了，她就一下子给咽了气了。人早就不行了，就等我哥来见了最后一面，说了一句话，就死了。就算是两口子见了最后一面。我哥可怜，把我哥伤心的，接婆娘去了，婆娘就死在他眼前了。我哥以后精神上就有病了，下一年又把娃死了，饿死了，才三岁个女娃。婆娘死了，娃死了。我哥给伤了心了，再不问媳妇了。谁说都不要，谁说都不要，再不娶媳妇了……到现在还是一个人过着。八十一了，还是一个人。我哥是个痴情的人，也是念过书的人，吃斋念佛的人。把心给伤了，如果来了人给他说媳妇，他就睡下不起来了。每天天黑了，我哥就点个灯，坐在炕上，唱着唱着，身子摇着唱着，就唱一个晚上，不找其他的女人。

依：他唱什么？

牛：哼哼唧唧不知道唱啥哩。正夜不睡觉，那人神经受刺激了。你想想，先是第一年十一月娃死了，第二年二月媳妇就走了，可怜得很，打击太重，再没有结婚。

依：你们那里饿死的人多吗？

牛：爷！从甘谷那边过来，在那个深沟里，都是人，用麦草裹起来的人。没有人给埋，看沟渠里麦草裹住的人多得很，这里几个，那里几个，满了，满了，人死了就扔到沟里了。

人饿得受不了，二十几天不见面，就吃那个草、野菜，就吃那个，我说把人饿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人都饿疯了。

依：你们那里有没有人吃人的事情？

牛：有一个，有一个婆（土语：奶奶）把孙子杀着吃上了。儿子饿得跑出去找吃的去了，媳妇小娃在家里。那个下午，媳妇给婆婆说：“妈，我回娘家去，咱没有吃的，我回娘家找些吃的去。”媳妇回了娘家，那个晚上没有回来。天黑了，他婆把娃给杀着吃了。是个男娃，三岁了。三岁娃，有啥肉嘛？第二天，干部在门口喊叫着让干活去，进去问：“你弄啥哩？不做活去？”就看见案板上血呼呼的，干部问：“你媳妇哩？咋不见娃？”老婆子说：“媳妇回娘家去了，我把娃吃了。我把娃吃了。”队长不相信，就说：“你胡说！胡说！”“那个老婆子说：“真的，娃还在锅里呢。”队长把锅一揭开，娃的头还煮在锅里呢。

依：把这个人法办了吗？

牛：公家来人就把老婆子拉走了，把那个砍了娃的刀子，煮了娃的锅都拿走了。

依：这是哪一个乡？

牛：大庄乡，甘谷县大庄乡。那一天，公家来拉这个人，村里人都见了，最后就枪毙了，你杀人就是犯罪了，再饿杀人就犯罪了。杀人犯，有意杀人。人后来说也奇怪，一般杀了人的人都不承认，她就说在锅里哩，把人脑子饿出毛病了。把人饿疯了。他婆把自己孙娃吃了，老婆子小小的脚，饿糊涂了，饿糊涂了。她把娃抱到三岁了，不饿能下得了手？人都成了狼了嘛。老婆子也可怜，也可怜。人饿空了，走路走着就死了。

依：你看见死人吗？

牛：看见嘛，从路边走，往沟里一看，就是用麦草裹住扔掉的人，两头扎住，就扔了。人都瘦干了，扔了就扔了，山区，没有人管。有些沟有上百米深，人臭了都闻不着个味道了。人都瘦干了，还能臭吗？

依：那时候打粮食吗？

牛：打粮食哩，公家把人赶去炼铁，能干活的人不能在庄稼地里干活。在家的都是老人，脚小的，干不成活。年轻人到白岭渠，又是啥家渠，又是炼铁厂，劳力都调走了。有点粮食还拉走了，动弹不了的就往死里饿，没有点办法。那个时间，人就往死里饿，没有办法。如果有人给穿针引线，就跟上跑了，先逃活命。在屋里等死呀？那些小脚老婆子，就走不动，有人领也走不动。我就硬逃出来了。陇西、定西、通渭都是苦地方，饿死的人没有数。

依：你是怎么过来陕西的？

牛：我是遭了年景跑过来的。有一个女人，前一年的二月，从甘肃来这里住了一年，回去转娘家。就领我来了。

依：你那时候成家了吗？

牛：成了家了，家里饿的呆不住，只有走。出去逃个活命去。

依：那人家（注：丈夫）让你走？

牛：让走。那个婆娘回娘家，我说：“你把我领上走。”我有个娃，是个女娃，两岁了，我就领上来了。我把娃领来了陕西，后来他又领回去了……把娃后来也给糟蹋了。我二十三了，是人家的娃，人家领走了，回去了娃又死了。说回去给娃买了一包麻糖，把娃的喉咙给卡住了，把娃给没有了，娃都四岁、五岁了。人家领我来的，不然，我没有本事来。先领到那个婆娘家里，住了几天，有个人介绍到这里来。

依：甘肃那个男人怎么办？，没有叫你回去吗？

牛：离婚了，闹了半天，我是好马不吃回头草。他经常不在家，在外面要饭吃哩，那个家庭我呆不住。因此我才能走，年景不好，咱就走了，谁都顾不上谁了。到了六一年，咱给娘家去了信，他知道了，跑来陕西叫我回去，我说：“我不回去，回去弄啥？吃屎嘛？”“我就没有回去，他就把娃领走了。他是按照我给娘家的信的地址找上来的。第二次，他又来了，要和我离婚，从甘肃开了介绍来，来就离婚了。来也好着哩，算是逃了活命了。

依：你到这个家情况怎么样？

牛：我这老汉叫个石银生，弟兄三个，只有两间房子，可怜的很，二十七了，还没有媳妇，穷得没有人跟。我来，说比我大两岁，实际上大四岁。那不要紧，咱不嫌弃，就是家穷，人好着哩。我说，咱甘肃女人到这里来就是收拾烂货，找不好的，人家条件好的还不要咱。看不上咱。我来了找了个穷鬼，还要给老二、老三娶媳妇，咱是老大，老大就是大。给老二娶了个高价媳妇，要一千块钱。借帐，慢慢还。我就给人家还了六百元的账，那时候的六百元多值钱？……家里的老人还一直害怕我走，以后有兄弟媳妇了，就分开家，自己过自己的，两间房子分了半边房，我就说人是一口气。我要了三个娃，一个女子，两个男娃子。我来那几年可怜得很，咱是个离乡人，把苦吃多了，少吃没喝，要啥没有啥。我就要和别人过的一样，我成天纺线织布，我来才学着纺线织布，我织布还快得很。我没有黑明的织布，哎呀，我的爷，把苦受多了。都好几年了，我这老汉到山里背木头，背椽，就盖了两间房子。账务还完，日子还没有过，娃长大了，要娶媳妇了……。我来了陕西，就把我的小弟弄到陕西来了，我就心疼我这个兄弟，再没有管我哥。有吃的有穿的，都给我兄弟。我兄弟结了婚，有了两个儿子，三个女子。这里有厂子，在厂里干，后来修车，做生意，就在户县买了房子。就是我哥还在甘肃，就独个过着，给人算命，到处走，混一口饭吃上。就是我哥一个人在那里，受可怜。

后记：再听录音的时候，我听出来一个细节，牛玉凤说：“我嫂子在人家的房檐下睡了一个晚上，人家不敢让她进门。”让我心疼、难过极了。嫂子只有二十一岁，是一个年青的妻子，一个刚有娃娃的母亲，可是她死了，累死了，饿死了，病死了。

“你怎么才来接我？”那一夜，她是怎么熬过来的？没有人知道。

五十多年了，她的丈夫用一辈子的独身不娶回答这个问题。■

【大饥荒】

## 一九六零年（二）

### ——三年自然灾害

陆 凌

“不是天灾”——刘庆邦

1960年《人民日报》国庆社论中写到，今年全国受灾面积达九亿亩之多，占我国全部播种面积的一半左右，是建国以来遭受到最大自然灾害的一年。1961年元旦社论中又说，1960年我国农业遭受了特大的自然灾害。这样的灾害是百年未有的。不仅如此，又追述1959年也有六亿亩受灾。

当时的粮食短缺或农业危机，真的是“自然灾害”造成的吗？如果没有记错，两年多以前，毛不是还担心粮食多了吃不完怎么办吗？怎么突然就不够了、饿肚子了呢？

九梓上陈村的华叔说，五九年秋天有点旱，影响收成了。《定远县志》中，有一节的标题就是“自然灾害”，其中提到旱涝虫等六种灾害，在附录中专门记录了1954年的水灾和1978年的大旱，1954年定远因水灾“损失粮食3000万公斤，入冬后灾民食宿严重困难”。1978年又因旱灾，“全县粮食产量减产50%以上”。值得注意，无论是1954年，还是1978年，定远均没有发生饥荒，人口总数没有减少。<sup>1</sup>

《定远县志》中没有任何1959—1961年遭受旱涝大灾的记录。华叔说，缺粮的原因是浮夸导致的高征购，收下的粮食被直接送粮站了。定远1959—1961年的饥荒与“自然灾害”无关。

刘庆邦在《平原上的歌谣》中，用乡间最朴素的民谣唱出作家心中最深刻的痛。书中

<sup>1</sup> 《定远县志》，第122-126页，黄山书社出版发行，1995年2月第1版。

“不是天灾”的小标题，<sup>1</sup>让我看到中国文人的良心与倔强。当政者的高压，捂不住所有人的嘴巴；当政者的谎言，骗不了亿万曾被饿得奄奄一息、在死亡边缘挣扎的农民。

三年大饥荒是由“三年自然灾害”导致的，这一说法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 1. 从“三年自然灾害”到“三年困难时期”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的公报中，指出农业生产计划没有完成，是“由于在1959年的严重自然灾害之后，1960年又遭到百年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农业生产连续两年遭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随后，官方文件、领导人讲话和新闻媒体，就众口一词地宣传“自然灾害”了。至今，和普通中国民众说起六〇年前后的饥荒，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还是，你说的是“三年自然灾害”吧？

其实，为了遮掩恶行，老天爷并不是第一个替罪羊。1959年，当权者曾把各地大批人因饥饿而死说成是瘟疫流行。1960年，信阳事件发生后，又把饿死人归罪于基层所谓的坏人当权。当瘟疫和坏人的借口，都无法解释饥荒何以如此长久地蔓延全国时，当权者只好怪老天爷了。再到后来，当权者明白，单怪老天也无法掩饰他们闯下的弥天大祸，只好又拿苏联人说事。

1981年，中共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终于把1959—1961年的严重经济困难，与“大跃进”和“反右倾”挂上了钩；但是，欲罢不能，还是把所谓自然灾害和苏联因素，说成是导致困难的另外两个原因<sup>2</sup>。从此以后，官方在说这段历史时，就改称“三年困难时期”，不再提什么“三年自然灾害”了。

刘庆邦义愤填膺地宣告，饥荒的原因不是天灾：他不相信1959—1961年中国发生了无法抗拒的、百年不遇的大灾害。至少，他的家乡那几年是风调雨顺的。

民不聊生，困苦不堪，群情激愤，暗流汹涌。把饥荒牵强地归罪于天灾，说得过去吗？

## 2. 从“七分天灾”到“七分人祸”

<sup>1</sup> 刘庆邦：《平原上的歌谣》，第130-131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11。

<sup>2</sup>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19页，人民出版社，1981.7。



1960年夏某日，北京中南海西门（国务院西大门）外。

### 中南海反标事件

7月26日上午，中南海西门外侧砖墙上，赫然出现六张标语，长条形八开白纸上墨水黑字写着：“打倒人民公社！”“铲除、消灭人民公社！”“人民公社使大家都挨饿，人民公社不好！”“人民公社是发展生产的障碍！”“人民公社是阻碍社会主义前进的高山！”

.....

矛头直指“三面红旗”中的一面——人民公社！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可谓大逆不道，反动至极。令人意想不到的，如此严重的反标事件，竟毫无悬念地当场告破。公安局接到报案后，三位公安跳上吉普，飞奔中南海，半小时赶到现场。他们发现标语旁站着一位20出头的年轻女子。女公安急步上前，厉声喝问这些标语是否是她所贴，年轻女子毫不犹豫点头承认，再问姓名、年龄、来自何地，她也一一作答。女公安叫她上车，她也没有丝毫反抗。西城区公安局随后宣布：你犯有张贴反动标语的罪行，从现在起，你被拘留了！

此女是何人居然如此嚣张？她为何要张贴这些标语？

她叫刘桂阳，1938年出生在湖南衡阳县上峰乡，事发时，是湖南郴州鲤鱼江电厂的运煤工。1960年6月，回乡探亲，发现家乡食堂断炊，爷爷浮肿病重。刘心如刀绞，虽自知人微言轻，执拗性格使其欲罢不能，终于决定只身赴京，采用非常之举，上陈故乡危急灾情。

郴州县法院很快以反革命罪，判处刘桂阳五年有期徒刑，服刑期间，爷爷被饿死了。1961年初，湖南省公安厅拟对刘桂阳改判，公安部呈请刘少奇批示，刘亲自批复同意。同年4月，刘少奇在家乡调查时，向湖南省公安厅长李强当面查询此案，李说已改判，予以释放，回原单位工作。<sup>1</sup>发生在天子脚下影响这么大的要案，居然是无罪释放，难以置信前所未有，这说明社会上很多人、包括政府干部，对饥荒十分不满，对刘桂阳非常同情。

到了1961年中，中共高层对于饥荒诱因的看法也出现了分歧，“自然灾害”的说法受

<sup>1</sup> 张步真：《渴望真话——刘少奇在1961》，第224-233页，珠海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

到了质疑。（下图：刘少奇 1961 年四月在湖南调查）



1961 年 4 月初到 5 月中，刘少奇回湖南考察 44 天，亲眼看到家乡农民饥寒交迫生活艰辛，清楚地了解到公共食堂的危害。4 月 15 日，毛收到在韶山调查的胡乔木的长信后，肯定韶山可先行试点解散公共食堂。<sup>2</sup>4 月 17 日，刘解散了长沙县天华大队的公共食堂。5 月 31 日，

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问到，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3

1962 年春节前后，中共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全国两千多个县和重要企业的负责人全部到会，参会人数 7118 人，空前绝后，史称“七千人大会”。1 月 27 日，在全体大会上，当着毛的面，刘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sup>4</sup>

显然，把三年大饥荒说成“三年自然灾害”，农民不服，普通干部不服，刘桂阳更不服。

为了让思辨更加全面，必须简要分析一下 1959—1961 年中国的气象资料，看看当时是否发生了大旱大涝。或许，连“三分天灾”的说法，也无法成立。

### 3. “这三年是正常年景”

农业气象学家高素华是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高带领的团队分析研究了 1951—1990 年间中国的气象资料，这些资料是从全国分布大致均匀的 350 个站点采集的。在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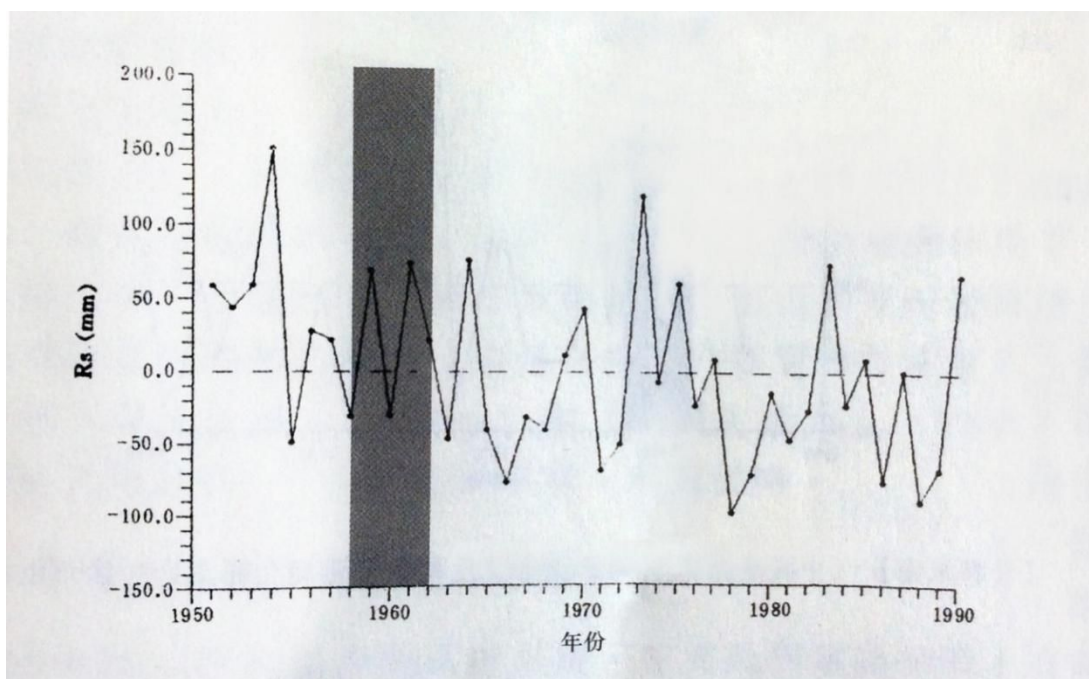
<sup>2</sup>叶永烈：《胡乔木——中共中央一支笔》，第 170-171 页，广西人民出版社，2011。

<sup>3</sup>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 718 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

<sup>4</sup>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 719 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

研究基础之上，高主编了《中国农业气候资源及主要农作物产量变化图集》，书中的曲线图形象地描述了1958—1961年中国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如降水量、气温等因素，和其它年份的比较。

图表 2-1：1951—1990 年中国年降水量距平均水平时间变化曲线<sup>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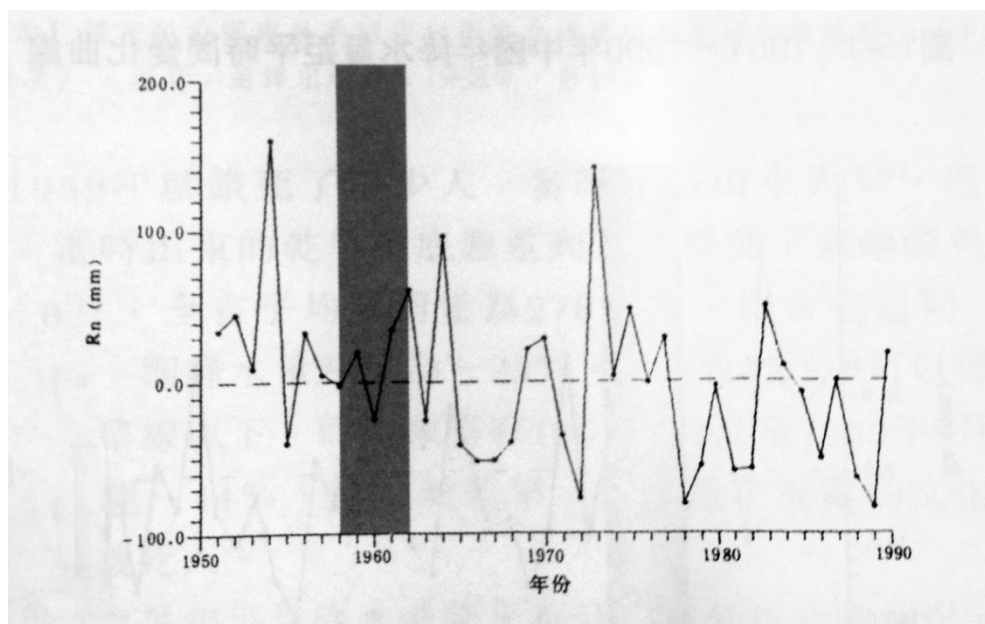
在上图中，可以清楚看到各年降水量与四十年平均降水量的差别。1960 年的数字是 -30%，为一般干旱，其干旱程度远远低于 1955、1963、1966、1971、1978、1986、1988 等年份。1959、1961 年距平均水平的数字为 +80%，是一般涝年，但其洪涝程度远远低于 1954、1973 年。

为了更加准确地分析气候资源与农作物产量的关系，高的团队还制作了农作物生长季（4—10 月）降水量距平均水平的曲线图（见下图）。从总体趋势来看，1959—1961 这三年生长季降水量，距平均水平的偏离幅度是四十年来最小的。

图表 2-2：1950—1990 年农作物生长季（4—10 月）降水量距平均水平时间变化曲线<sup>2</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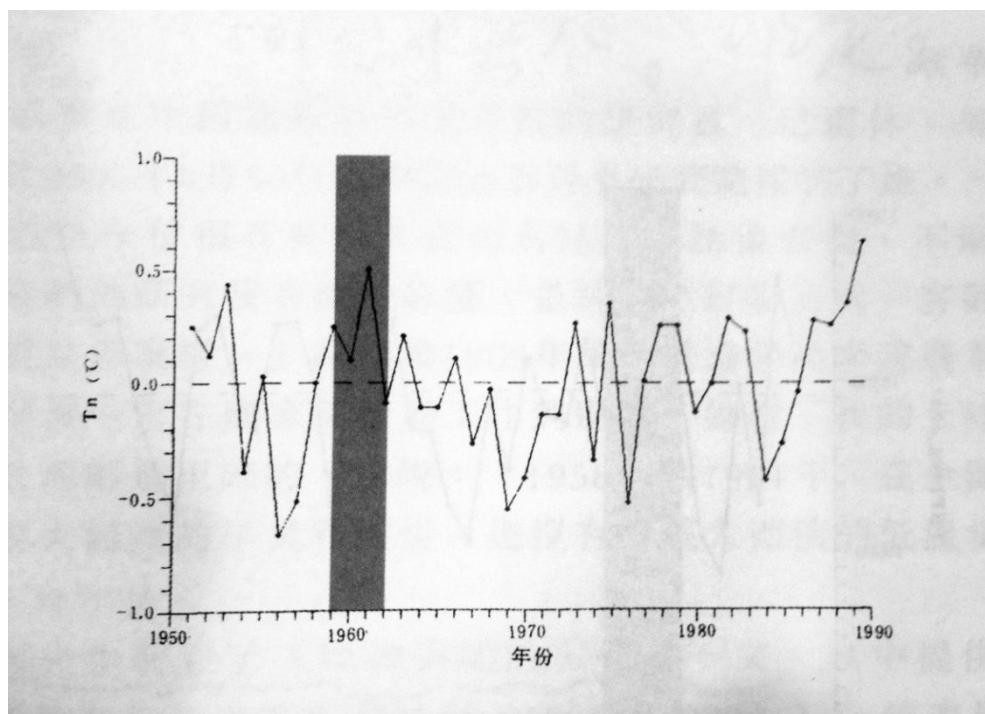
<sup>1</sup>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 649 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9.6，第七版。

<sup>2</sup>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 650 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9.6，第七版。



此外，气温对农作物的生长也有重要影响。下图中我们可以看到，1958—1961 年的气温同历史平均水平的偏差也不是历年来最大的。

图表 2-3：1950—1990 年平均气温距平均水平变化曲线<sup>1</sup>



<sup>1</sup>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 651 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9.6，第七版。

2005年8月30日，杨继绳先生在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采访了高素华女士。高说，1958—1961年，在全国范围内没有出现大面积的旱灾和涝灾，也没有出现大面积的低温灾害。这三年是正常年景。<sup>1</sup>注意，这里有个小瑕疵：高前面说1958—1961（四年），后面的结论“这三年是正常年景”，前后不符，也可能是杨的笔误。瑕不掩瑜，三年是正常年景的科学论断，超脱政治，令人信服。

刘庆邦写到，“这地方如此缺粮食，缺吃的，有的人已经饿死，有的人眼看也要饿死，并不是这里遇到了什么自然灾害。两三年来，这里没有旱灾，没有涝灾，也没有蝗灾。……称得上风调雨顺。”<sup>2</sup>

看来，就连“三分天灾”的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为何国内还有学者不遗余力地声称，那三年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是出现三年经济困难的一个直接客观的原因呢？毋庸置疑，其中有政治的因素。本书的目的，是用确凿的证据论证大饥荒的存在，用通俗朴实的语言把饥荒的惨况及诱因告诉民众。质疑其他研究者或学者的成果及动机，不是本书的目的。

退一步来看，就算那三年中国真的遭受了百年未有的“自然灾害”，发生长达三年波及全国的大饥荒，就理所当然了？发生百年来最惨烈、饿死千万农民（这里为了严谨，不说几千万）的大灾祸，就说得过去了？我们简略回顾一下中国的饥荒史，从中，也许能够找到一些答案；或者，发现更多的问题。

#### 4. 《中国——饥荒的国度》<sup>3</sup>

“从公元前206年到1949年的2155年内，我国发生较大的旱灾1056次……，较大的水灾1092次”。<sup>4</sup>较大的旱涝灾害，累计2148次，几乎一年一次，年年有灾。如此简单计算，当然不够科学，仅供参考。然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旱涝灾害不多，约为总数的十分之一。丁抒在《人祸》中说，“纵观中国历史，1949年…之前的2129年中，共发生203

<sup>1</sup>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647-653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9.6，第七版。

<sup>2</sup>刘庆邦：《平原上的歌谣》，第130-131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11。

<sup>3</sup>凯恩：《中国的大饥荒（1959-1961）——对人口和社会的影响》，第30页，毕健康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12，提到马洛里的经典著作——《中国——饥荒的国度》（1926年）；贝克：Hungry Ghosts-Mao's Secret Famine, 第9页，Henry Holt & Company, LLC, New York, 1996。

<sup>4</sup>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643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9.6，第七版。

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死亡了 2991 万多人。”<sup>1</sup>丁先生说的数字是否靠谱，尚未核实，暂且存疑。

九梓上陈的华叔提到，听老辈人说，咸丰六年，定远旱灾，也发生了人吃人的事情。咸丰六年是 1856 年，大清正处于太平天国的战乱之中。看来，对于人吃人的惨况，华叔不仅耳闻，可能也目睹了。

1876—1879 年，北方连续大旱，爆发“丁戊奇荒”<sup>2</sup>，受灾地区为北方五省，饿死人数估计在 900 万到 1300 万之间，是 1959—1961 年饥荒之前史上记载的最大规模的饥荒了。<sup>3</sup>彭尼·凯恩指出，（清）政府奋力救灾，非政府部门，特别是乡绅和商人们的赈灾作用是很明显的。<sup>4</sup>

1928—1930 年西北大饥荒，“造成这种饥荒的最重要而直接的原因是持续不断的干旱，在有些情况下会先于战争而发生，而在其他情况下则因战争而加剧，……这块地区经常发生大范围的饥荒，最著名的是 1876—1879 年和 1920—1922 年的饥荒。尽管通常认为由于运输基础设施（铁路）的改进以及国际合作，在 1920—1922 年饥荒中实际的死亡人数要远少于之前 1876—1879 年的饥荒（估计是 50 万对 950 万至 1300 万），在 1928—1930 年则估计有一千万人死去。”<sup>5</sup>

### 又是河南，又是 300 万

电影《一九四二》改编自刘震云的小说。1942 年夏到 1943 年春，河南发生旱灾，景象令人触目惊心。全省夏秋两季大部绝收。大旱之后，又遇蝗灾。灾民五百万，占全省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水旱蝗汤”，袭击全省一百一十个县。灾民吃草根树皮，饿殍遍野。……寥寥中原，赤地千里，河南饿死三百万人之多。<sup>6</sup>十七年后，中原大地，饥荒又起，河南再

<sup>1</sup>丁抒：《人祸——‘大跃进’与大饥荒》，第 8 页，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1997 年 7 月修订本。

<sup>2</sup>这次大旱以 1877 和 1878 两年为主，这两年的阴历干支纪年属丁丑、戊寅，学界称之为“丁戊奇荒”。

<sup>3</sup>贝克：Hungry Ghosts—Mao's Secret Famine, 第 11, 273 页，Henry Holt & Company, LLC, New York, 1996。

<sup>4</sup>凯恩：《中国的大饥荒（1959—1961）——对人口和社会的影响》，第 38 页，毕健康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12。

<sup>5</sup>扬库（Janku）编：《“天灾乎，人祸乎”：1928—1930 年西北大饥荒》，第 234—235 页，袁剑译，刊载于《中国学术》第 30 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sup>6</sup>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网络下载，页码及版本不详。

次伏尸千里，再次饿死约 300 万人<sup>1</sup>，死亡数字与 1942—1943 年旱灾蝗灾造成的几乎相同。政府对灾情同样视若无睹、置若罔闻，虽江山已易，物是人非，此政府已非彼政府，历史何以能够如此残酷地相似？不同的是，1960 年，河南没有天灾，中原处于和平而非战争状态；河南不再有教会的粥场，不再有外国记者，不再有侵华日军，相当一部分饥民无法逃荒，只能无助地、默默地、无声无息地死去。

灾害不胜枚举，饥荒屡屡发生，中国的确是一个饱受灾害困扰、饥荒肆虐的国度。从这个视角来观察，发生在 1959—1961 年间的“三年大饥荒”，并不算罕见。因此，1959—1961 年间，如果中国真的“遭到百年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那么发生大饥荒、饿死千万甚至几千万人，政府就能够脱了干系、说得过去、甚至心安理得了，民众也能够见怪不怪、逆来顺受、受之坦然了。我想，这是政府处心积虑地宣传“三年自然灾害”的原始动机，也是御用文人想方设法地论证饥荒是天灾所致的根本原因吧。

这里面有个问题：如果 1959—1961 年的大饥荒确如中共所说，是“自然灾害”造成，那么当时中共为何不全力以赴、大张旗鼓地救灾？反而要刻意掩盖、甚至断然否认呢？布吕内尔把中国的三年大饥荒归类为“人为且被否饥荒”，<sup>2</sup>可谓言简意赅，切中要害。饥荒是“人为”的，所以“被否”。答案就这么简单。

“自然灾害”一说，不能成立。苏联因素对饥荒又有怎样的影响呢？如果说，把三年大饥荒归咎于自然灾害，是欺骗民众天理难容，那么，把它归罪于苏联，就是无中生，并忘恩负义。■

<sup>1</sup>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 114 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9.6，第七版。杨还明确提到历史地理学家曹树基的数字是 293.9 万。曹的专著《大饥荒——1959—1961 年的中国人口》，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 年，虽多方努力，未能找到拜读。

<sup>2</sup>布吕内尔：《饥荒与政治》，第 69 页，王吉会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2。

【述 往】

## 军垦农场里的“性”

——大学生“再教育”中的“四不准”

漂 木

1968年毕业分配的大学生，据说有三分之一到了军垦农场劳动锻炼，见习工资由总后系统支付，政治待遇说为副排级。武汉水院62级施工、治河专业有9个同学分到8221部队——武汉军区的一个独立炮团，11月，该团调沙市隶属重新组建的17军，而大学生连队由军管平顶山市的8212部队（炮兵第二师）接管，属19分队（师侦察营）管理。该营有测地连、光测连、声测连三个连的建制，预设一个航测连；我们学生兵有四、五、六三个连，男女生三百多人，主要来自郑州大学、开封师院、新乡师院、河南农学院、河南工学院、百泉农专，还有清华、天大水利系十余人，北大、黑龙江商学院两人。该师前身为四野炮纵，辽沈战役的功臣部队，后参加过金城反击战、炮击金门，营级干部多为东北来的老同志，很受接受再教育大学生爱戴。

水院到河南军垦的都是南方人，现在回忆起来，基本上都还没有谈过恋爱，而河南同学多数已涉“性”，有的已结婚，有的已谈过，有的正在谈，甚至有的上大学就已为人父母……所以两性问题，对他们已不新鲜，而我们水院去的，除一宁乡人结婚了，都还带着好奇心观察在军垦农场发生的一切。好在原来炮二师没有太看重这个似乎敏感的问题，甚至我所在的第四连，是男女混合编制，含有一个女生排和两个男生排，开会与进餐前的集体高歌，则是男女生混声合唱，十分和谐、动听……俗话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我们那时出工干活，种菜、挖煤、割麦打麦、插秧、收稻、射击，半夜起来到农村宣传“最新指示”，真是无忧无虑，痛快充实，赛过在学校。



但是不久，军区就有了新精神，据说叫做“四不准”——学生连不准男女接触，接触了不准谈恋爱，恋爱了的不许结婚，结婚了的不准同居！而且有人传说就是军区政委刘丰提出和决定的，所以也俗称作“刘丰的四不准”。四连的那个女生排也被撤走编入女生连，临走时那顿散伙饭，都有恋恋不舍之感，气氛真有些“十送红军”唱的那样缠绵。我们那时可能还没开窍，也没有太反感这一决定，反正再教育嘛，首先是改造旧思想，又不是专门到农场去找女人的，但河南学生年纪偏大，结婚的很多，就非常反感，潜行微词往往转变成议论纷纷，但又被极其吓人的“抵制再教育”压制着。所以水院同学几乎都在看河南人的笑话。

到1969年春，清华水利系的老高，未婚妻在西安国防科委90号信箱工作，来平顶山探视，女方年纪较大，要求办婚事，侦察营不批准。怎么办？清华人找几个学生干部商量，去市砖瓦厂革命委员会开证明，说老高是他们厂的技术员，就在地方民政部门办了结婚证。我们在隆冬时节曾在该厂劳动，拉土烧砖，革命委员会头头欣然帮了这个忙。结果清华全体同学和一批学生干部（副排长和个别班长），聚集在湛河边小树林中，悄悄举行了婚礼，并准备了丰盛的酒菜野餐。消息很快传到管学生的军人那里，我们的连长——一个南阳来的兵，入伍前曾是某县高中造反派，铁着脸在全连训话：私自结婚抵制再教育，要处分老高。他声明这个结婚属于非法，要生了孩儿，就是黑孩儿，要吊销他的户口……云云。（不过几年后，有原农场的河南同学在路上碰见他，他已转业，并主动谈起这件事，也后悔自己那时候太左了……）

我们连炊事班副班长老李，是郑大数学系的革委会主任，一次老婆来探亲——只能冷冷清清地睡在茅草房的招待所里。那天晚上，炊事班班长（军人），为了恪守军区政治部的规定，不让学生违反纪律，竟然通宵未眠，数次打亮打火机，查看老李是否还睡在自己的铺上……我相信他们俩都激动得整晚未能入眠，尽管凌晨就得起来准备全连早餐。

在我们农场，也在湖北的沉湖农场（那里有16个学生连），渐渐流传出一个顺口溜——“男农场、女农场，中间隔道铁丝网。不能看，只能想；想起来，泪汪汪……”，首创

人是谁，已弄不清楚了。大概属于集体创作并修改。

老高私自结婚的事情还没有了，部队已经将问题反映到了军区政治部，等政治部做结论和处理。这时发生了一件几乎扭转乾坤的大事情：河南省省委书记、武汉军区第二政委刘建勋同志到平顶山出差，顺便到了我们农场，炮二师师长、政委陪同。

刘建勋是三十年代搞学潮投身革命的。他接见全体学生，一开始就讲了一句动情的话：你们在郑州时，我嫌你们太吵，但你们离开郑州后，我又觉得太冷清……！这是说的文革高潮期间革命领导干部和河南大学生的那些互动往事。到现在我想起这句话，还鼻子酸酸的。其他说的啥，全都忘记了。但后面有个小故事：听学生干部说，我们全体解散后，把学生干部都留了下来，河南的学生干部，几乎都是各学校的院系造反派头头，和刘建勋十分熟悉的，刘说有些话想与学生单独说说，解放军在这里是不是不太方便？……师长会意，忙说我们先离开……军人走后，刘建勋就说：有什么意见，说吧！那些头头们又像文革初期一样，七嘴八舌就讲开了。当时，我们对十分艰苦的劳动没有不满，对解放军政治、纪律，没有意见，对解放军的管理，学生们的确有不少意见。但说得最多的，意见最大的，现在的年轻人不会想到的居然是——“性”——“四不准”！

谈毕，刘建勋出来见到军人们后，当着他们就问农学院的武彩霞：“小武啊，想不想小范啊？”小武大咧咧地回答：“想啊！”小范是其未婚夫，是农学院革委会主任、省革委会常委，在比邻的叶县住队。刘又问你想不想去看他呀？我要去叶县。小武心领神会答：“想去看，但师长不叫去！”刘建勋问师长：“我要去叶县，你让不让小武也一起去呀？”师长只好说“我没有意见，听政委的！”

结果武彩霞就是乘坐刘建勋的小车，到叶县去了。

刘建勋这一来一走，消息不胫而走，至少平顶山农场的“四不准”就没那么神秘了。

收麦后，军区政治部来了两个干部，听了师部和侦察营的汇报，决定不处理“私自结婚”的老高了，此后，我们农场的“四不准”就形同虚设了。

但是，平顶山农场的事情还没有完。我与郑大的革委会主任张书震的床是并行的，他

早已结婚，回家探亲去了，他那双人蚊帐笼罩着我们两张床，我一个人享用。一天，还没有熄灯，我在床上看书，听见营房前有人大骂、喧哗，高呼什么“反对修正主义”、“打倒流氓”！“我非要把这个混进解放军的败类揪出来不可”！不久，五连的新乡师范学院革委会主任黄宗万（省革命委员会常委）进入我们营房（可睡一个排），并且拉开蚊帐就钻到书震的床上，大声说“躺这里干啥，中国就要修了，你还有兴趣看书睡觉”！他说有人欺负我们女同学了，你起不起来保护同学？据说有一个学生连的军人排长，非要追问回家探亲回来的女同学，交待自己性交的过程。女同学又羞又气，告诉了其他女同学，又传到他们的头头老黄耳里。这就是“修正主义”？不就是有人也性饥渴性变态吧，我忍住没有笑，说马上就要熄灯了，你明天再揪这个“败类”行不行，过一晚上中国还修不了嘛。黄很气愤，大叫不能过夜，马上就得把他赶出去！不能让学生在学生连做事。于是，他钻出蚊帐，又在营区鼓噪大家起来，大吵大嚷，闹到半夜。

结果，老黄死死抓住那个犯事的军人，硬要部队把他调回解放军连队了，当然部队管理和调动有个程序，不是当晚就能轰走的。（这老黄犟牛脾气，吃了大亏，后来河南“清查”，他被捕，判了十多年刑，在牢里不依不顺，上了镣铐，要他钻门洞啃饭吃，最后神经失常了……）

女生连有个同学回家把四岁的儿子带到部队农场养着乱跑，她们都叫他七连长，我开始不懂哪里有一个七连啊？原来她们是说笑话，对一个带到部队的孩子而言。她们估计要坚持再教育继续当兵，非得增加一个连的孩子的编制，那么这个“第一者”，就可任命为连长了。

我这些故事后来给同龄人说过多次，不是讲笑话，而是重蹈痛楚；也不是演义，是我在平顶山见到和听到的真实故事。

我们农场在武汉军区下属学生连队打开了禁区，但不是每一个部队农场都能仿效的。毕竟我们那里集中了太多河南各学校的造反派头头，他们敢说敢干，而且刘建勋政委又去

过那里，希望解放军同志注意再教育中的有关政策。

1969年12月，部队得到指令要搬到天门县的白湖，于是侦察营给学生放假七天，回家探亲，我在河南无亲可探，水院低年级同学都“斗批改”到长阳、罗田了。也没有女友可找，于是跟着一个营级的修械所管理员和炊事班到天门农场新址，打灶作前站。天门离汉川沉湖很近，我顺便去沉湖农场探望水院同学，那时同学被分配到湖区一个一个的连队，围垦造田，居住分散。从汉口到这里的班船要走一个晚上，大概早晨6、7点钟到码头，到达时天还漆黑的，我上岸，随便推开岸边的一间草屋门试一试，房里就有水院电化和治河专业系的同学！我又到女生连去看我们年级在纸厂工作的同学，她们都住在一个农家，我就端坐在堂屋中，谈话时，不断有其他学校女生爬在门口露出半个头，又缩回去，咯吱咯吱地笑，笑什么看什么呢？听女同学讲，她们除了见男军人、在码头卸船时会见到其他连男同学外，平时还是只能看到女同学。大概想看稀罕，想知道是谁的朋友来了。那时代都不用“性”这个词，其实，后面就是一个“性”的烦恼，确实动摇了接受再教育的决心。我顿时联想起《西游记》里的女儿国，那纷纷传说“人种来了”的性喜悦境界……女同学真不容易，沉湖湖田不比河南的麦茬稻田，泥很深很深，女同学插秧时，湖泥最深可齐腰，蚂蝗还直咬，每走一步，可能比红军过草地还艰难，实在走不动，就翻滚出来。一些人例假来了还坚持下田啊，回到驻地累的说不出话来，糊满淤泥的旧军装一脱，就倒在床上。

在沉湖农场听说了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

这里国防科委系统的学生比较多。一个属于科委系统的，是学生连的副连长，她的男友已在外事口工作，多次要求到农场来看她，她总以再教育的“四不准”为理由，婉拒男友到来。毕竟自己就要带头嘛，她也是个坚毅的女性。最后，男友有长期公务要出国了，坚持到了汉口，也坐班船来到汉川的沉湖农场。得到男友电报，这位女副连长提前到码头迎接，就在码头上，她正色告诉男友，见了就行了，赶快回去，不能留他。他们一番话后，义愤填膺的男同胞毅然回头，向刚刚坐的船走去，该班船就此打返——回汉口去了！副连长一屁股落在码头上痛苦起来……其实那时没有什么性解放，青年人只是希望拉拉手、谈

谈心。听到这个故事，我联想起苏联小说《第四十一》来，那是我们批判过的修正主义文学——苏联优秀短篇小说，那个女红军玛柳特卡警告无效，一枪打死了自己的俘虏——曾爱上了的蓝眼珠白军军官，然后痛哭了起来。我这联想实在不该，她爱的是个敌人，而我们的五七副连长爱的是青年外交战士。居然都在水边痛哭，我们的这革命啦……

后来，又听见别人续了这个故事。不甘心的外交战士回去后，通过外事口机构，联系了武汉军区，两下反复沟通，军区政治部经过研究，最后决定批准副连长去北京送别一下。爱情自然没有军情紧急，来回请示，研究，到军区批准下来，6092部队再逐级通知到学生连，距离外事航班启程，只有一天了！解放军也真是好样的，师部又特批派出军用嘎斯把她送到武汉（船要走一宿，来不及的，但车在汉江堤上也得走四个钟头），一算，武汉到北京的特快也得走十几个小时，为赶时间，军区特批用武空的例行班机，把她带到北京。真是亲人解放军啊！为抢时间，通过请示协调，军机又特别直飞首都机场（那时候空管和机场调配都由空军统一管理，从南苑或西郊机场到首都机场还有几个小时路程）！

简直如精彩电影般，一环扣一环那样紧张。

可惜的是，当她从军机上下到机场地面，国际航班刚刚起飞……我们的“玛柳特卡”再次放声大哭。

我不知道这里有无学生们演绎的成分，但我相信当时大学生农场中还有更能打动人心的真实故事。现在的年轻人会讥笑我们那一代人走过的路，但我记录这些事情时，我的同学们在看到这些事实时，总会潜然泪下的。

而豫北有个农场，据说有男女夜里在地里亲热偷欢，连长在连队训话时揶揄道：你们大学生也算文明人了，就在红薯地里干那……属狗的吗？说的也算对。几年后批孔，我才知道“野合”这个词汇是什么意思。文明人孔丘，不也是野合而出吗？■

【述 往】

## 家世拾零

### ——我的爹爹和父亲（一）

慰 祖

#### 一、建国前的爹爹和父亲

我的祖籍位于江汉平原的湖北天门。

祖父马知方出身农家，读过一两年私塾，粗通文墨。年少时学徒制作丝线，因劳累过度而驼背，成了“罗锅”（我10岁那年突发急性关节炎，不能行走，祖父背着我去朝阳医院，其驼背还把我的胸口咯得生疼）。祖父学徒满师后就开始自己做丝线，与祖母在别人家的屋檐下摆摊出售，惨淡经营。祖父兄弟五人只有他一人有能力结婚成家。有一年汉江发大水，淹没了“棉乡”天门的田地，棉线生意因此锐减，丝线销售蒸蒸日上。这次“转机”使祖父淘到了“第一桶金”，慢慢就有了自己的小手工作坊和店铺：“前店后场”，还雇佣了几个师傅徒弟。家父回忆小时家里吃饭常常有十来个人，包括那些师傅徒弟，都是在一起就餐。祖母梁氏先后生过5个孩子，只存活了3个：家父和他的两个姐姐。

祖父告诉我：大革命时期他曾被推举为两湖农民运动中的农会委员。1927年国民党汪精卫集团“分共”后，为了躲避风头，他还跑到乡下藏了一个多月才敢回家。

家父5岁开蒙入私塾，10岁插班进新式小学四年级就读。1938年，因日本侵华，初中毕业的家父在16岁离家赴鄂西山区，入湖北省主席陈诚任校长的湖北省联合中学求学。所有学生食宿学杂费全免，每年还发两套衣服，冬天发一件棉背心。陈校长常来看望师生，晚间巡视宿舍，还给学生掖被子（这也成为家父日后被打成“右派”的罪名之一：“美化国民党”）。鄂西山区冬季奇寒，因没有棉鞋穿，学生脚上常生冻疮，红肿流脓。家父勤

奋刻苦，每天天一亮就上山朗读英文，以致多年后还可以给我们背诵英语课文。家父告诉我们：学习外语可以给人打开一扇门窗，了解到一个新的世界。

家父自幼酷爱文学，但为了日后便于就业而进入湖北省高级商业学校就读。该校系国立中等专业学校，全体学生须集体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

学校举办中国象棋赛，就在操场上画了棋盘，由学生头顶写着车马炮字样的大纸帽，在操场上游走。师生们坐在半山坡上观战。第二天的报纸报道这条趣闻时的标题就是：“操场当棋盘，人头作棋子”。

家父在校期间还亲历过一次“日全食”：一天午后，家父正在小溪边洗衣服，天色突然暗了下来，眼看着水中的太阳渐渐被一团移动的黑影遮盖，随后就是一片黑暗，出现了满天星斗。随着水中这团黑影的缓缓移动，太阳又一点一点地显露了出来，最终重见天日。只见小溪边、山坡上，许多老太太跪在地上，敲着盆皿，嚎啕大哭。这就是民间流传的所谓“天狗吃太阳”吧。

在抗战这段山河残破，民生凋敝的艰难时期，教育事业取得了惊人的进展。陈立夫在1994年台湾出版的回忆录《成败之鉴》中说：他“不顾当时行政院政务处和财政部内部人员反对”，批准了救济战区青年的方案，沦陷区青年在后方中等以上学校读书，由国库支給贷金。“这一笔庞大的费用，在国家财务支出上仅次于军费”。多数大中学生享受政府免费教育、免费伙食及一定的医疗保障。新中国为重大科技成果做出重要贡献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有不少就是由大后方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和浙江大学、中央大学、交通大学等校培养的。

苦读数年毕业后，家父先后在陪都重庆国民政府农林部和重庆市政府当会计。1939年，蒋介石训令全国各机关公务人员于一年内一律加入国民党，届期如无党籍者，有官者免官，有职者免职。<sup>1</sup> 作为政府工作人员，家父也受命填写了一张加入国民党的表格，但其后就没了下文。既没有交过党费，也没有过一次组织生活。

<sup>1</sup> 国民党湖北省执行委员会档案，湖北省档案馆藏，卷号LS66，第261页。

被誉为中国“会计学之父”的留美博士潘序伦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私立会计事务所、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和立信出版社，将西方会计学理论和操作方式传播到中国。抗战期间，潘序伦博士将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从上海迁到了山城重庆，家父遂进入该校就读，曾数次回乡省亲并与家母成婚。

抗战胜利后，家父辞去公职，随其就读的立信会计专科学校迁回上海，一年毕业之后有半年之久找不到工作。无所寄托，每天只好在当年最繁华的上海街头游荡，买两个烧饼充饥，或者吃一碗最便宜的“阳春面”。就在走投无路准备返乡之际，终于经老乡辗转介绍，找到了在超大型国企中纺公司的稳定工作。

抗战胜利以后，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拒绝将原日资在华纺织企业出售或者租赁给因日本侵华战争严重受损的民族纺织业者经营。民营资本一时也无力并购，而且发生了严重的失业工潮。为了使原敌伪企业迅速恢复生产力，平抑物价和缓解就业压力，宋子文遂指令国民政府经济部将原日资在华纺织企业整合，于1945年12月成立了当时堪称世界上最大的纺织企业集团：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其下属的58家企业囊括了纺织业的所有部门，享受着低息贷款、官价外汇、大宗低价美棉配额、特准出口纱布换棉业务等优惠政策，还得以凭借雄厚的资金在国内各产棉区遍设分庄，在收花季节抢先收购，又得储运之便，原棉存量丰厚，很快就向国家财政上交了高额利税并垄断了全国的花纱布市场。

当年像家父这种受过英美式会计学训练的人毕竟不多，再加上家父的智慧，工作认真负责，很快就被提拔为东亚最大的印染企业——上海第一印染厂的会计主任，进入了管理层。公司里的老财务科长曾对家父说：你真是年少得志啊，我26岁的时候，还在军舰上当瞭望兵！家父说，进了这家公司，就如同捧上了“金饭碗”：不仅月薪高达90元大洋（可以购买一两黄金），而且作为中层管理人员，每天都可以享用丰盛的午餐，鸡鸭鱼肉都吃腻了。后来恶性通货膨胀的时候，公司甚至用进口的高级衣料作为薪酬，来替代日日贬值的法币。家父说，那时每当发了工资，下班后就立即上街抢购，几乎是看见什么就买什么。有一次，一个月的薪水只值一双昂贵的进口皮鞋。



家父自己混出来以后，就委托同学陈克明将家母带到了上海。不久，家父感念祖父母一生含辛茹苦，遂要他们来上海一起生活。祖父母于是关闭了丝线店铺，买了15亩田地交给一个亲戚代管，亦于1948年来到上海。一家人居住在日华宿舍，是原日华纱厂（三厂、四厂）的中国员工宿舍，位于劳勃生路（Robison Road）和槟榔路（现安远路）交界的三角地带，现在的地名为：长寿路893-901号，和丰里。1926年曾在路口建有一座钟塔，人称“大白鸣钟”，远近闻名。可惜在建国后的1959年被拆除了。

半年后，祖父母因在大城市生活不习惯又返回了老家。代管了田地半年多的那个亲戚挑着一担礼物来看祖父，希望继续经营这块田地，祖父没有答应，将土地收回自己耕种。结果没有想到惹下大祸：那个亲戚因此怀恨在心，在建国后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坚持说祖父收了地租。祖父母因而被打成了地主，被没收了土地房屋等全部财产，扫地出门。祖父母一生辛劳盖起的作坊店铺及住房，被用作了镇政府的办公场所。

短短三年后，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就作为“官僚资本”被新中国政府没收。上海解放前夜，公司里有人暗中告诫家父：要坚守岗位，保护好财务账簿档案。家父默默照办了。由于炮火阻隔，家父曾经有一周不能回家，家母独自在家且断了粮。幸亏隔壁的公司同事陈荣曾家的陈太太接济了一饼干桶的大米，家母每日喝粥，才得以度过难关。建国后，家父被视为进步职员的代表、工会积极分子，还当选中纺公司总工会委员。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明确指出：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中国的通俗名称，叫做官僚资本主义。因而官僚资本并不是政治经济学概念。家父一直不解的是：解放前我进的是国营企业，也不是宋子文的家族企业，怎么就成了“官僚资本”？

## 二、进京

1950年，家父第一次来到北京，到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开会。他的发言和专业素质，引起了部里财务部门负责人的注意。经中纺部主持工作的副部长兼党组书记钱之光点

名指示后，随即找家父谈话：新政权建设需要专业人员，切望留部工作。

因一时无法在北京安家，家父就雇了一条小木船从上海溯江西上，一路总算是有惊无险，将家母和我送回了湖北老家，大弟就是在天门县出生的。

家父调纺织工业部工作时，财务部门（初期还没有司局一级的设置）只有两个科：家父任会计科科长，一同从上海调来的朱宜兆任财务科科长。但未曾料到工资待遇却因此减半，从原先的月薪120元降到每月600斤小米（时值60元：旧币60万元）。就这样，还引起部里很多解放区老干部的羡慕，因为建国初对他们实行的仍然是供给制，没有工资，每月只有几元津贴。29岁的家父满怀激情投入了新中国热火朝天的建设事业，参与了纺织行业财务管理制度的制定工作，执笔起草了新中国纺织行业的第一部会计管理规范文稿。由于过去受的是西方教育，家父就到人民大学去旁听苏星教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还顺应当时学习社会主义苏联老大哥的社会新风气，参加了俄语班的学习。

家父在北京听说祖父被打成地主后心急如焚，提出要回老家看看。部里领导明确指示：作为国家干部，对家乡的“土地改革”运动必须回避。家父只好作罢，无可奈何。我一直不明白的是：作为被剥夺了公民权的地主分子，祖父却一直享有选举权。来到北京以后，还参加过朝阳区人大代表的选举，我就亲眼见过祖父的选举证。

北京中纺部东郊宿舍最初的几栋两层红色小楼盖好后，我们母子三人于1952年底来到北京。接着，祖父母和外婆也来到北京生活。

家父到纺织工业部工作以后，财务司司长拿来入党志愿书，要家父填表。家父不禁想起10年前在重庆国府工作时，填表加入国民党的往事，遂婉言谢绝。家父仍是旧时知识分子的那种思维方式：建国前我就是凭本事吃饭，现在我还是不吃党派饭。当然，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家父所不敢启齿的：他在内心深处对共产党怀有一种疑虑。

建国初期，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各部门的负责人，有不少是周恩来的老部下。如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钱之光及部办公厅王副主任等。力主将家父调进部里的这个财务

司司长，恰好不是周恩来总理的嫡系。这样，家父就在无意之中被卷进了部里的派系纠葛。家父耳闻目睹这种水火不容的派系成见，十分不解：怎么共产党也是这样？惹不起，还躲不起吗？还是不入这个党，离他们远一点好。结果，这个财务司司长最终还是被排挤出了中央纺织工业部，调任成都铁路局局长。有一天在王府井大街相遇，他临别时握着家父的手还差点流出了眼泪：什么时候再有机会共事？他对家父的业务能力十分赞赏，意欲家父随他一起去成都。家父觉得从上海来北京工资待遇已经减半，再去成都还有什么意思？又过了很长时间，家父无意之中向后任的财务司司长打听前任司长的近况。没想到，后任司长居然板着脸狠狠瞪着家父一言不发，此情此景令家父心寒。不久，家父也被挤出了纺织工业部，调入苏联首批援建的156个大型项目中的北京第一棉纺厂，为第一任财务科科长。家父因此叹息：如果就是在工厂里当个财务科长，何必来北京？那还不如在上海，起码工资待遇不会减半。

当然，家父被调出纺织工业部也有其个人的缘故。家父生性耿直，脾气暴躁，对某些老干部不懂业务指手画脚，从上海同来的朱宜照总是俯首帖耳、唯唯诺诺，而家父却在一旁抱不平，出言不逊。如果是家父自己与这些领导发生争论，他更是当面顶撞，得罪了不少人。家父到北京国棉一厂当财务科长以后，依然是禀性难移，还顶撞过国棉一厂的党委书记兼厂长李昭（胡耀邦夫人，后任市纺织局副局长兼党委书记）。家父日后挨整，与这种恃才傲物的做派不无关联。

家父在北京国棉一厂当了两年财务科长，突然又来了调令：到中南纺织管理局（郑州）任财务处处长。家父表示不愿去：如果是这样，当初何必离开上海？之后，纺织部财务司司长找家父谈话：目前正在筹建中央纺织工业部干部学校，以培训全国纺织企业的负责人。家父遂调往中央纺织干校任教，为干校的筹建人之一，参与了基建财务工作。随后开始了半年之久的备课，准备讲授财务管理课程。据说，因家父曾任上海第一印染厂会计主任，该厂首任厂长、20年代留英专攻染整技术的我国第一代染整专家、以“民主人士”身份担任纺织部副部长的陈维稷（中共秘密党员）曾对纺织干校郭启明校长说，你们那里的老马

是个人才！在1956年新中国第一次进行职称评定时，家父被定为高教七级。

### 三、1957年反右后的遭遇

1957年，毛主席发动了“引蛇出洞”的反右运动，家父因此而大难临头。纺织工业部干部学校到了反右派斗争的后期，还没有揪出一个右派。在纺织部反右领导小组的督促下，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纺织干校的有关领导就开始在教职员工中搜寻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干校教师张羽和王叔文的一些言行被人揭发，有了重大嫌疑。这两个人为了洗刷自己，就拼命转移目标找替死鬼，罗织罪名上纲上线，往家父身上泼污水。结果两个人逃过一劫，只受到了党内处分。仍在纺织部财务司工作的上海老干部王良才因在工作中有过积怨，此时也落井下石，积极揭发家父的种种“罪行”。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张琴秋在大会上点名：纺织干校有一个马某某，居然鼓吹英国“海德公园”式的民主！结果家父被打成了“右派分子”。纺织干校的党委委员高恩渊因不同意将家父打成“右派”，也受到党内处分，被打成了“中右”（不向群众公布）。

家父被打成“右派分子”后工资被降了两级，月薪从126元降为87元，加上家母的月薪53元，每月靠140元供养9口之家（三个老人，四个孩子）。虽然比当时北京市每人每月10元的最低生活费要高一些，但在中纺部宿舍大院的环境里，仍属于低收入家庭。

随后，家父接到指令：全家下放黑龙江接受劳动改造。家父决定：祖父母和外婆回湖北天门老家，他和母亲带我们兄妹四人去黑龙江。家父随即开始做奔赴黑龙江的准备：拿出积蓄置办了两件皮大衣，还请假回家搜罗木板，钉了一个硕大的木头箱子。就在准备启程之时，老天有眼，峰回路转。干校校长郭启明表示：老马这样的人，现在用不着，将来总还是要用的吧。遂提出将家父留下，纺织部的主管副部长王达成也就同意了。当年在共产党内，还是有不少正直有良知的老干部。不然的话，我们全家被发配到北大荒，紧接着就是“三年大饥荒”，一家人还不知会遭遇什么厄运。当年在北大荒劳改的右派们所遭受

的非人磨难，时人多有记述：1958年早春，国家机关和驻京部队机关近三千名“右派”，同乘一列慢车出山海关，被遣送到北大荒劳动改造。其中就有著名作家陈明、丁玲夫妇，吴祖光、聂绀弩、陈沂、沈默君、李景波，书画家黄苗子，丁聪、尹瘦石、杨角等。毛泽东的兼职秘书李锐在北大荒险些饿死；著名女歌唱家张权的丈夫、年仅41岁的音乐家莫桂新等一大批右派分子，都葬身于北大荒的劳改之中。2002年3月9日，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发现一本1963年7月造册的《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收录了来自北京的94名死于黑龙江兴凯湖农场和京郊清河农场、北苑农场的劳教“右派”。

侥幸逃脱了全家被发配到北大荒的厄运后，家父随同哲学教师张羽1959年在安徽农村下放劳动一年。纺织工业部人事司的一个老处长去安徽视察干部下放劳动的情况，她看到既要接受劳动改造，又负有监督右派责任的张羽和家父挤在一张单人床上睡午觉，还训斥张羽：“你怎么和右派在一张床上睡觉！”

从安徽农村下放劳动回来以后，家父被安排继续进行劳动改造，在中纺部东郊宿舍大院里掏粪种菜供应食堂，院里的小伙伴们都知道我爸爸是掏大粪的。

鉴于家父的“罪行”还不是很严重，所以只划为第五类右派（第六类不戴帽子），经过四年的劳动改造以后，家父终于被摘掉了“右派”帽子，被安排到学校食堂做会计（1961年，全国有近10万名“右派分子”摘帽）。作为一个长期担任过大型企业财务部门的负责人，并执笔起草过新中国纺织行业第一部财务管理制度的专业人员，家父的内心当然还是有所不满：“英雄无用武之地啊”。

#### 四、文革蒙难

1959年，在中央纺织干校的基础上建立了北京纺织工学院。1961年更名为北京化学纤维工学院。没有想到的是，几年以后的文革风暴，给我们全家带来了更大的灾难。

1966年8月29日，“北京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发布了“第四号通令”，其中第7

条说：“确实查明并斗争过的黑六类分子，尤其是逃亡地富分子，除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置外，其余一律给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限期（于九月十日前）离开北京回原籍劳动，由革命群众监督改造，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这个“通令”在北京全城以至全国张贴公布。直接后果是北京城中有近十万人口被扫地出门。祖父也因此被赶出了北京。爹爹伴随着我们的童年，为我们兄妹四人操持午饭，未料到就这样离开了我们的家。更未曾料到我们的家在三年之后就彻底搬离北京，天南海北，一分为五了。

由于在职称评定时被破格提拔，又逃脱了下放黑龙江的厄运，家父被说成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郭启明院长的“十大红人”之一，多次参加“陪斗”。家父生性倔强，不肯老老实实低头认罪而吃了不少亏。北京化纤工学院行政后勤的一些人按照文革初期流行的做法，强迫“牛鬼蛇神”们在被批斗游街时敲着锣喊“我是大坏蛋！”愤怒的家父扔掉了锣，拒绝喊而被打掉了多颗牙齿。此后，家父就被关押在学校，每日被监督劳改。

由于家父在斗争会上拒不认罪，学校后勤部门的一些工人就威胁：“再不认账就抄你家！”家父还是不肯认罪。学校后勤的几个司机和炊事员一商量，就将上下班用的大轿车开了过来。为首的女干将郭大风一冲进来就大喊：“你们抄，我把门！”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奇特“抄家”：当年红卫兵们抄家，其重点往往是翻箱倒柜搜寻“反革命罪证”。而这些成年人却把这次“抄家”变成了“搬家”，他们没有多少翻检，也不打开箱子看看，把父母从上海带来的四五个牛皮箱子和其它便于搬运的家具等物品往班车上一扔，就扬长而去。住在隔壁的薛某，因当过国民党军官，本来并不具备抄家者的资格，不知为何也参与了这次抄家行动。临走时他大喊：他们家还有一间小屋！于是一伙人又冲进小屋，没发现什么好东西，随即离去。历次政治运动和文革的确是给人性中恶的一面发酵膨胀，提供了众多的机遇和便利的条件。

在那个年代，凡是被抄了家，就被定位为“阶级敌人”了。我们家被打入了社会最底层的贱民阶级，其子女也就成了地富反坏右“黑五类”的“狗崽子”。这天的夜晚，左邻右舍的一些孩子扒着北屋的窗户往里窥视。我家连灯都不敢开，一家人静静地坐着不知所

措。16岁的我作为家中的长子，在当年是一个被“洗了脑”的热血少年。虽然我并不十分明了这些人为什么要抄我的家，但我还是遵从当时的“革命”理念，拿出了《毛泽东选集》，组织全家人学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当革命革到我们自己头上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正确对待、端正态度。

从建国前的上海算起，父母20年来积攒下来衣物用品，就这样被洗劫一空。当时的抄家物品，除了文物和贵重财物，大都作低价处理了。后来在给家父落实政策退赔的时候，只作价区区130元人民币了事，还说“相信您会不再纠缠”。家父只好回到家里愤怒地轻声抱怨：什么叫“纠缠”？家母则庆幸事先将两个金戒指藏到办公室了，没有被他们抄走。令人称奇叫绝的是，后来退还了几件家父的西装上衣，而西裤却一件也未退还。因为在那个年代，没有人胆敢穿西服，但人人都敢穿西裤，大小肥瘦稍微改一下就可以穿了。家母旧日的旗袍也退还了几件，但绸缎被面却不见了踪影。几只从上海带来的高级牛皮箱子也没有归还。当初来抄家的人并非红卫兵小将，而是北京化纤工学院的正式职工，以后勤部门少数工人为主的成年人。文革中这些抄家、伤人、盗窃的刑事犯罪行为，绝大多数都没有被追究过法律责任。不论是红卫兵，还是这些成年人，如今都已安度晚年，出面道歉或表示忏悔的极少。

我们家被抄，中纺部宿舍家属委员会（居委会）唐主任等人也跟着积极起哄：在中纺部宿舍大院的中心地带，粮店大门左边的东墙上贴了一张布告，历数家父的“罪行”，还在布告的右下方贴了一张家父年轻时的照片。我多次在行人稀少时驻足，一遍遍地细读布告上的几行文字。每次路过，心中都充满了屈辱。有好几次都想等到半夜时去撕掉，但一直还是没有这个胆量。酝酿了一个多月，我才付诸了行动。那天晚上父母亲在里屋嘀咕了许久，终于下决心把11岁的舍妹叫了进去，问她敢不敢去把布告上的照片撕下来，如被人发现，就说是自己想去撕掉的。舍妹早有此意，一口答应。寒冬的夜晚风高月黑，院子里基本无人行走。就在舍妹快要走近布告时，突然昏暗的路灯下一个人的影子一闪便没了踪影，吓得舍妹赶忙躲了起来。过了半天没有动静，才又蹑手蹑脚来到布告前，却赫然发现照片

不见了！只剩下一个黑乎乎的窟窿，可那张照片傍晚时分还在啊。舍妹急忙跑回家告诉了父母亲。不管是谁撕的，大家总算是去掉了心上的一块石头。舍妹那天夜晚看到的黑影极有可能就是我，因为我撕掉照片后立即向南狂奔至中纺部宿舍的大门外，站在那里惊魂不定。等到不喘气了，我才悄悄回到家里。布告经一个多月的风吹日晒早已残破，照片也已经发黄，所以我撕了以后也没有引起什么反响。过了几天，我看没有什么动静，又去撕掉了布告上有家父名字的那块。又过了些日子，我告诉家母：布告上的照片是我撕掉的。妈妈欣慰地对我说，我们叫小妹去撕掉，结果小妹回来说已经没有了，原来是你啊。

没有想到的是，80 中的同班同学孙某，此前却对这张布告产生了极大兴趣。他家住朝外吉市口，从 80 中回家，一般都是沿着朝阳医院北门前的马路往西南去东大桥，不会穿越中纺部宿舍大院。这天放学他不走，特地等着我回家时，跟着我穿越中纺部宿舍大院绕行。当走到那张布告前，他有意停下来假装阅读布告，同时频频扭头看我，观察我的反应。我站在那里十分难受，最后还是没有和他告别就回家了。这一幕深深留在了记忆之中，以致 50 年后回想起来，仍然是历历在目。这个同学在当年也是深受极左思想影响的人，但还是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跟踪我？

让我感到莫名其妙的是，这种不愉快的事情在其后又发生过几次。两年多之后，我从锡林郭勒草原回到北京探亲。一天正坐在家中低着头冥思苦想，突然抬头一看，这位孙同学赫然站在我的面前，居高临下地冷冷看着我。我十分诧异：他是什么时候连门也不敲就悄悄进了我家？他站在那里开口就问：“你在内蒙表现怎么样？”我十分不快：你他妈算个什么东西，在我面前以监督者自居！是在让我向你汇报思想吗？我于是告诉他：我这次是受公社专案组指派，去河北执行“外调”任务路过北京的。他对我的回答显然感到意外，就板着脸一言不发地走了。又过了两天，在关东店商场看到他迎面走过来，我走上去大声喊他，他看都不看我，就一言不发地从我面前过去了。我楞在原地，半天才缓过劲来。20 多年后再次相遇，这位同学主动热情地和我打招呼，而我们几位同学都对他比较冷淡，他当然也会感觉到。我们同学都大骂 80 中原初三的班主任毕振民，而他却因与班主任关系密



切而很不高兴。临别时，我又是大声和他说再见，他却再次不理不睬地扬长而去。又过了几年，突然接到他打来的电话，说他已在陕西汽车制造厂下岗，想在北京找点事做，我不冷不热地敷衍了几句。看来他早就忘了文革时给我的伤害，不然怎么好意思打电话让我提供再就业的线索？

我们这些在少年时代被洗过脑的人，如今绝大多数都明白过来了。后来与这位同学又有多次相遇，他也从未向我有所表示，估计早就淡忘了这些陈年往事，大概只有我才小肚鸡肠耿耿于怀？■

【述 往】

## 镇反纪实：我的劳改三十年（三）

——提篮桥监狱

王丕忠

### 窗外的枪声

一进监狱，所见的情景给人的印象与看守所很不同。后者布满了公安部队，气象森严，声势吓人，而监狱内见不到公安部队，里面的干部和工作人员对犯人也并不很严厉。犯人们可以互相低声交谈，也可向四周观看，没有人来禁止，气氛比较缓和。可是从建筑物的空隙中可以看到，监狱的大围墙十分坚固，高达五米以上，墙头还有电网。所有监房都是六七层的钢骨水泥大楼。除监狱大门外，每座楼进口处，每层楼的楼梯口，每间监房，都有圆钢条门。每座门安装了特殊的锁，须用钥匙转动三下才能开锁，要想撬开是不可能的。在如此坚固严密的防范下，逃跑或暴动无疑是被有效地防止了。如果一间监房出事，扩散不到其他监房；一层监房出事扩散不到其他各层；一座楼出事，扩散不到其它楼。

整个监狱的监房都是极小的房间，长约二公尺，宽约一公尺半，水泥地。墙角放了一

个木制便桶。按监房规定，所有的被褥衣物必须整齐地叠放在便桶对面的墙角。一间监房住三个犯人，其中两个人靠墙的一边端坐，腿不许伸直，留出另一边的墙边给另一人在一公尺的空隙上来回走动，情况如同铁笼关着的野兽。端坐和走动的三人按次序轮换，每一轮多少时间没有规定，因为没有钟表，无法掌握，只由三人自行决定。一般由走动的人做主，走累了便自动坐下，由另一人轮换。我初进去时，这样一间房住三人还不觉很挤。其后一间住进四人，在天气最热的日子里竟住进五人，挤得满身冒汗。夜里睡觉，一头二人，一头三人，挤得紧紧，肉碰肉，头碰脚，翻身都困难，恐怕猪圈里的猪睡时还比我们松动一些。

为什么会有这样多的人关进来？据后来入监的犯人透露：一天夜里，全市通宵进行大逮捕，各公安分局看守所关满了人，容纳不下了，便陆续往监狱送。看守所本来是专用红色警车押送罪犯去刑场执行枪决的，后来未决犯太多了，黑色警车不够用，于是红色警车也用来押送未决犯。其实这情况在大逮捕以前已经存在，我本人也是因此被红色警车押来的。

关进监狱以后，除偶尔在监房中听走廊上扩音器广播党的政策、国内外形势、罪犯应有的认识以及对罪犯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以外，提审、斗争、逼供等事却都没有了。虽然自己的问题还未解决，对我的处理仍是悬案，至少使我暂时松一口气，精神上暂时比较安定，但对家人的思念和对自已的生命的顾虑却片刻不能消除。

天气愈来愈热，五个人整天整夜地挤在三平方公尺的小监房中，实在难受，我终于受不住，发痧病倒了。在当时情况下当然得不到好的医疗和休息，只是吃了从看守处要来的痧药水，靠着墙角昏睡。幸亏遇到重新编队和调整监房，我被调入的监房是在大楼的底层，虽很阴暗但较凉爽，我的病就慢慢好起来了。监狱当局为防止犯人久居在一起发生感情，合伙图谋不轨，所以定时编队并调整监房。这一防范措施使我有机会遇到很多各色各样的人，听到很多新闻和消息。其中有一些是我想象不到的事，很令我惊奇。当然很大一部分是关于大逮捕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情况。因为有人是不久前才被捕的，他们知道在我入狱

后外界发生的事情。对这类消息，我们又想听又怕听，对未决犯来说，是刺激和恐怖的。

有一次编队，我被调到监狱西侧的一座大楼。每天定时听到“嘣嘣”的声音。起初我们以为是从监狱工厂的车间中发出的声音，不在意。日子一多，发生怀疑，听起来，声音好像是枪声。可是监狱处于闹市区，按理不会有开枪的情况，而声音都是在每天上午开饭时发生，也决不是出于偶尔的事端。这究竟是什么声音？始终猜不出。

其后又逢编队调监房，这一回我被调到监狱最西头的一座大楼，我被关入的监房朝西在最高一层。我们刚搬进去时已近傍晚，服役犯多人正忙着把浓石灰水涂在窗户的玻璃上，不知是为了什么？不过这件事很引起我的注意，因为犯人们是处于任人割宰的境地，心理上认为四周发生的情况，都会与自己的命运有关，对于莫明其妙的事，更会产生疑惧。所有的玻璃窗被涂上石灰后，只能透光，不能透视，但都仍敞开，并未关上，想是由于天气热的原因。

到了次日上午十时左右开饭时，服役犯来关窗户，把朝西所有的窗户都关上，空气一下子闷热起来。当时午饭已经送来，每人一个扁圆形铅（铝？）质饭盒的米饭，上面有一小撮咸菜，另外每人一杯开水。大家正在吃着，忽然一声巨响，有如晴天霹雳，听得出是开排枪的声音，接着是零星的枪声。正在吃饭的人突然受此一惊，饭盒几乎从手中抛掉。大家这才明白大楼西侧正在执行枪决犯人，以前还以为是从犯人工厂发出的声响。对于这座楼把玻璃窗涂上石灰的原因，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大约过了半小时，窗户重新打开，微风从窗外吹进，身上虽感到凉快，可是精神上受此刺激，背上了更重的包袱。从服役犯饭后收集来的空饭盒中，可看出那餐饭吃剩下饭的人不少。日子一久，大家摸着了一些规律，即早晨天未大亮时被叫出去的犯人，一出监房铁栏即被反铐，由四名公安部队人员押走，那便是近中午时被枪决的。因此在每天黎明时押走一批犯人后，监房中留下的人就说：两个铅盒又可到手了。两个铅盒是指两个饭盒，即每人一天的伙食，午前十时一次，午后五时一次。意思是又可多活一天了。这成为当时的流行话。也不知过了多少天，窗外每天定时的枪声忽然没有了，大家精神感到一松，以为严厉镇压、大批枪决“犯人”已临近尾声，

或者已告结束。要杀的多数已杀了，幸存者活命的可能增加了。其实这是妄想。据此后陆续关进来的刚被捕的知情人透露的实际情况，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

监狱中本来是不执行死刑的，死刑都是在江湾刑场执行。由于大逮捕以后，判死刑的人愈来愈多，刑场来不及处理，再加押送犯人的车辆也不敷应用，当局于是把监狱最西边的一个院子辟作临时刑场，就近在监狱中执行死刑。新刑场围墙外是居民区，靠近围墙的楼房居民甚至可以俯瞰刑场。在监房窗子打开时，我们也可看到居民们在楼上窗户中和在阳台上活动。日子一久，围墙外的居民向监狱当局提出意见，每次执行死刑的枪声使他们心惊肉跳，恐怖不安。婴儿和小孩更是吓得不得了，甚至发生惊厥。为此请求当局停止在监狱内执行死刑。

## 监 啸

大约就在这段时间，我经历了一种前所未闻的事，就是“监啸”。当时我一无所知，所以在发生时不知是“监啸”。有一夜我梦到火警，好像意识到自己是在监狱中，关在铁栏杆之内。梦见烈火即将烧身时，无法逃避，特别恐怖，于是握着铁栏杆使劲地摇，且大声呼叫。就在这时忽然惊醒了，发现自己确实是在监房站着，在摇着那丝毫不动的铁栏杆，同时是在不断地大声呼叫求救，也听到整个大楼的犯人在嚎叫，声嘶力竭，震耳欲聋，而且凄厉可怕，好似着魔。但时间很短，不一会儿声音渐渐低下来，以至消失，接着是一片死寂。随着是看守的呼叫声，命令大家躺下睡觉，谁再喊叫就要揪出来严惩。这是怎么回事？当时我莫名其妙，在惊吓之余，久久不能入眠。

第二天中午，典狱长宣布上大课，听广播。犯人们猜到是关于昨夜发生的事，果然不出所料。大课内容的大意是说，昨夜发生的“监啸”，是在押的反革命分子制造的，目的是想借此挑起暴动。下令犯人们以每个监房为单位进行讨论，互相检举，找出各监房中谁最先带头呼叫。每个犯人要交代自己当时是什么情况和想法，为首的要主动坦白交代，知

情者要检举揭发，争取从宽处理和立功受奖。讨论结果要做出详细纪录，上交核实处理。

犯人们遵照指示，以每个监房为单位进行讨论。大家神情紧张，惶惶不安，可是出事时刻还在梦中，迷迷糊糊，谁也说不上是谁先叫喊。至于每个人对自己当时的情况和想法，也是无从说起，因为都是在似梦非梦的状态中，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于是三言两语搪塞过关。

此后大约过了一个多星期，当局又传令听广播，传达的大意是：这次监啸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企图暴动挑起的。经过深入调查，三名为首的罪犯已经查出，并已镇压。警告在押犯人必须安分守己，严守纪律监规，决不可胡思乱想，轻举妄动，否则自寻死路，政府执法严明，决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大家听到此案已告结束，本人不致被牵连进去，心中一宽。至于那三人如何会被查出，是否属实，都不去管它了。一个人处于危急恐怖的关头，心理状态是极度混乱和自私的，对人的同情心低落。可能是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对待以至迫害，没有人来同情的原因。因此只求自己幸免于难，不管别人死活，正义感更是谈不上了；道德观念差的人，甚至会诬陷别人来开脱自己。这种事例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表现得最突出最普遍最明显，此是后话。

当局所谓那次“监啸”是反革命分子企图暴动而挑起的，其实是无稽之谈。后来我从一本心理学的书上看到，“监啸”还有“营啸”，是住在集体宿舍中的人，例如犯人或士兵，由于神经极度紧张引起的。“营啸”比“监啸”更可怕，士兵高声呼号之外还乱跑乱窜，甚至乱开枪。但是监狱建筑坚固，防范严密，从监房到狱外，须经过四道铁门，围墙上上面有电网，四周岗塔林立，全由武装岗哨把守，又有探照灯报警器和机关枪。监房极小，只能容几个人，发挥不了群力的破坏作用，因此即使挑起“监啸”，也决引起不了暴动。当局对于已落入手掌中的“敌人”是毫不容情的，在处理上无所不用其极。

## 判 决

我所久盼的判决终于到来了。我以高兴和恐惧两种截然不同、互相矛盾的心情来迎接对我命运最重要的定夺。高兴的是不论好坏，问题可以得到早日解决，不用再提心吊胆，坐立不安了。恐惧的是估计不出自己的“罪行”有多重，如不免于死，对家人的刺激和影响太大了，他们怎能承受得住。虽说在公安局看守所中遇到的德国医生曾对我说过枪毙并不痛苦，他的说法是否可靠？无从证明。也可能是在我的处境下为了安慰我。再说求生存是生物的天性，一个人终究是怕死的。

那天中午，天气还很热，窗外阳光灿烂。我正坐在地上打瞌睡，看守来叫我的番号和姓名，我一下子紧张起来，心跳不止，预知必有大事临头。那时监房中还有另一人也被叫了。我俩穿着短裤背心，赤着脚，被看守引到大楼底层宽敞的通道中。

那里已有百余人成列坐在地上，排成长队。我到得较晚，当我坐下不久，便听到前面有人在叫犯人的番号和姓名，宣判开始了。叫到的人立即站起来，由看守押着，走到通道尽头，拐入大楼的进门处。那里的情况，成排坐着的人是看不见的，说话也听不到的。叫出去的人宣判后并不回原位，径直押回监房或他处。每次叫人的间隔很短，约二分来钟，有的较久。

大约叫过十多人便叫到了我。我随着看守走到通道尽头，拐到大楼大门的门厅处，那里有武装人员把守。靠近楼梯设有一个大办公桌，上面堆了许多公文夹。有几个干部坐在桌子旁，命我在离桌子约三公尺处站着，喝令垂首低头。坐在正中的干部，问过我姓名、年龄、籍贯后，便宣读对我的判决。我当时精神很紧张，可是还未达到慌乱的程度。对我的判决又很简短，因此我听得很清楚。大意是说，我在解放前任反动派特务，危害人民；解放后蒙政府宽大留用，但仍不知悔改，继续与人民为敌；收听“美国之音”、造谣、企图搞反动组织、企图赴港投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不发给判决书，不得上诉。下面签署的是解放军司令员的名字。

宣判完毕，即由看守推到楼梯口，押回监房。我回来不久，监房中一起叫去的那人也回来了。他是国民党的军人，案情不详，判了十五年。后来才知道我这一批是判处有期徒刑

的，间有少数判无期或死缓，总之不是判死刑。至于判死刑的犯人，估计就是凌晨交出去押走，将近中午时被枪决的那批人。是在清晨宣判，宣判后立即执行。

我既被判十二年徒刑，命总算是保住了，可是这漫长的岁月将怎样熬过？过去的两年，我还算是个公民，已过的是极为艰难的岁月，今后成了一个犯人，日子将怎样过？不堪设想。

判刑后的几天中，看守通知犯人们集中在走廊上大课，听广播。广播的大意是政府判你们徒刑是对你们的宽大，你们要认罪伏法，感激政府，转变人生观，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另外你们不要以为判刑是一锤定音、一成不变的，你们中间有人余罪没有交待，组织没有搞清，必须继续把余罪和组织坦白交待，彻底搞清问题，争取从宽处理，否则必定自食其果，后悔莫及。政府已掌握了你们所有的材料，你们想要蒙混过关是不可能的。现在给你们最后的机会，把自己的一切问题，毫无保留地交待清楚才是唯一的出路，切不可再犹豫等待。

判刑不久，又编队和换监房。盛暑已减威，天气凉快起来。这对我们四个人住不满四平方米的人来说真是天赐隆恩。四人中三人靠墙端坐，一人在另一边沿墙来回走动。这种方式自我入监以来一直未变，在监房格局的限制下也想不出更好的方式。就这样又过了许多天，气候更凉快了，夜里几乎冷起来，睡觉要盖棉被了，估计时令已入深秋。

有一天又上大课听广播。大意是：你们是危害国家、危害人民的犯罪分子，是人民的敌人，罪恶深重，民愤极大，本应严厉镇压，由于党和政府以宽大为怀，以治病救人为宗旨，只判你们有期徒刑，给你们机会改过自新。现在政府将进一步对你们宽大，那就是让你们去劳动改造，把你们调出监狱，有组织有纪律地从事生产和建设劳动。你们可从劳动中养成劳动生产的技能和习惯，并从中获得教育和改造，转变人生观和世界观。从不劳而获，变为自食其力。放弃反动立场，靠拢党靠拢政府，成为一个新人。这伟大的劳改政策是党和政府的创举，前所未有的，全世界所未有，是革命人道主义的体现。在向你们通知这喜讯的同时，还要向你们提出警告，你们出了监狱，活动的范围大了，等于恢复了一半自

由，切不可因此胡作非为，搞破坏活动，进行反革命勾当。重新犯罪，罪加一等，必受严厉惩处。法网如海，不要妄想逃得出去。

大家听完这广播，精神为之一振，人群中引起了轻微的骚动。这种铁窗风味实在不是好尝的，调出去劳改至少可自由一些，总比终年监禁要好过。但劳改究竟是怎么回事，不得要领。我当时的感受，我的生命好似惊涛骇浪里的一叶扁舟，随风逐波地在大海中飘航，随时有被淹没葬身鱼腹的可能，但也随时可遇到意外的获救的希望。那时据我体会，解放后中共政权在司法上建立了三项创举：一是劳动改造；二是非军事人员和非军事案件可由军事法庭来判决；三是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至于司法的独立性却完全被剥夺，司法机构完全成为执行政策的工具。

## 复判

徒刑已判，调出劳改也已宣布，想来事已定夺，哪知又发生了一桩意想不到的事。一天中午，看守来叫我和监房另一人，命我二人随他下楼到底层通道，即上次等候判刑的地方。那里已有百余人成列席地而坐，情况与前次判刑时一样。我不禁一惊，心想这绝不是好事。坐下后低声问身旁的人，他说不知道，可能是复判。我不大相信，哪会刚判不久又要复判，而且期间又没有发生什么事故。但如不是复判又是什么？

不一会便开始叫人了，也还是同上次一样，叫到名的人走到通道尽头，拐入大门门厅，只叫了几个人之后便叫到了我。于是和上次一样我被押到门厅一张长书桌前，仍旧叫我垂手低头站立，看来果然是复判。接着又发生了更为意料之外的事，宣判人在书桌上翻文件，有好几分钟不对我宣判。他与几名干部低声交谈，谈些什么？因为我站的位置离他们较远，听不清楚。过了一忽儿，其中一人对旁边站着的武装人员说：“先叫他回去等。”于是又把我押回通道原处，命我坐在犯人行列的最后面。

接着犯人们又一个跟着一个地被叫走，每次间隔约两分钟，这一百多人估计须四五个



小时才能叫完。由于忐忑不安，这等待宣判的时间很不好熬。也不知坐了多久，太阳落了，阳光从通道里消失，渐渐昏暗。我穿衣不多又赤着脚，久坐水泥地上觉得冷起来，很不好受。最后终于叫到我了，事实上已是最后一个，整个通道已是空荡荡了。

也许是因为时间已晚，宣判人员已感劳累和厌烦，对我宣读判决书时，声音既低，读得又快。我当时因等候的时间太长，头脑昏昏沉沉，所以对宣读的判决书没有听得很清。可是仍能听出这次的判决书比上次的冗长，内容较多。例如我的反动经历比上次的详细，罪行除收听“美国之音”、造谣、企图搞反动组织、企图赴港投匪外，又增添了诬蔑政府政策、威胁群众、攻击积极分子等项，最后的一句话“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是用强调的语气提高了嗓音读的。

宣判完，看守把我押回监房时晚饭已经开过，同房的人为我留下了饭盒、开水。我无心吃饭，只吃了几口，把余下的给别人吃了。同我一起叫去复判的那人早已回来了。他的情况与我一样，也是判决书内容不同，刑期不变，仍是十五年。

据他说：“复判本来是很危险的。解放战争时期和解放后初期，被捕的反革命分子，判刑都比较轻。后来复判时就加重了。原来判处有期徒刑的人大多改判为无期、死缓或死刑。我们这次复判刑期照旧，不知是怎么回事。既然刑期不变又何必复判呢？”

这一情况他从何得知，我也没有问他。他是国民党的军人，文化较高，好像是个有军衔的文职人员，大学毕业，也懂英语。我想当然地认为他消息灵通，后来证明他所说的是确实的。因为不久以后监房中调来一个年轻已决犯，面目清秀，至多不过二十岁。他判决得比较早，那时还发给本人判决书，我和同房其他的人都没有发给判决书。出于好奇，问他要判决书看看究竟是什么样。那青年的判决书是一式七份，因为同案犯共有七人，都是青年，每人发给一份。他们一伙是武装匪特，从浙江舟山群岛潜入大陆后被捕。为首的是一个女青年，姓张，判决书中说她以色相引诱男青年参加武装特务组织，一同潜入大陆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他说他们原判都是有期徒刑，复判时，这七人中前六人都判死刑，立即执行，都已枪毙了。他本人原判只有三年，经不久前复判才加重的，判十年徒刑。他的

罪名是替其团伙窝藏机枪，但他并不是这组织的成员，否则恐怕也已镇压了。他说在枪毙其他六人时，他被陪绑去现场。在临刑前那女青年还和那几人相视微笑，真是十三点。又说那女青年还不足二十岁，长得很漂亮，复判死刑前是监狱文工团的成员，能歌善舞，经常参加文娱演出。

从这一案件中，可见复判要加重判刑是确实可信的。可是我们这次复判没加重，原因何在令人不解。■

### 【资 料】

## 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誓师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1967.02.22)

新华社贵阳二十一日电 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誓师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全文如下：

我们最最最敬爱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

我们永远忠于您的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怀着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敬的心情，向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致以最崇高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

今天，我们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在贵阳市举行了“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誓师大会”。我们万分激动地向您汇报：在您老人家的亲自号召和支持下，在以您老人家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正确指引下，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大联合，从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回贵州省的党、政、财、文大权以后，乘胜前进，经过酝酿和协商，由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驻军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的领导干部，建立了三结合的临时权

力机构——贵州省革命委员会。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新的伟大胜利！这是贵州一千七百万各族人民的天大喜事！

毛主席呵，毛主席！千言万语也表达不了我们对您的衷心热爱！我们欢歌，我们跳跃，千万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您老人家说：“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铭记您的教导。我们不但有胆略把大权夺过来，也完全有决心、有信心、有能力把权掌好、掌牢。“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扫除了害人虫，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好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贵州！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中诞生的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和全体革命派向您宣誓：

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我们一定要更高地、永远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坚决地贯彻执行以您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

您教导我们：“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我们一定要彻底地、不折不扣地、全面地执行您制定的一切方针政策。

“抓革命，促生产”，“要节约闹革命”，这是您发出的伟大号召。我们一定要百分之百地听您的话，百分之百地照您的指示办事，发动全省各族革命群众，大抓革命，大促生产，夺取革命和生产双胜利。一定要坚决打倒经济主义，不讲阔气，不讲排场，“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

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毛泽东思想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无穷无尽的力量，变成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我们一定要更好地活学活用您的著作，把活学活用您的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高潮，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我们一定要勇追穷寇，在全省范围内把各项大权统统夺回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知道，斗争仅仅是开始，巩固夺权的胜利，还要做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还要付出加倍的努力。“无限风光在险峰。”我们坚信，有您老人家的亲切关怀和支持，有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毛泽东思想，“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我们一定能够迅速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新秩序，一定能够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智慧，经过过渡，创建更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崭新的政权组织形式。

您老人家告诫我们：“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而放松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们的疯狂的报复阴谋的警惕性”。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铭记您的教诲，更加谦虚，更加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我们一定永远读您的书，听您的话，照您的指示办事，永远跟着您老人家，乘风破浪向前进！

让一切敌人在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面前，在我们接连不断的胜利欢声中抽泣吧！发抖吧！

瞻望未来，无限光明。贵州山上山下，必将风展红旗如画。让我们高举起双臂，迎接崭新的、红彤彤的、处处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芒的新贵州！

衷心地祝愿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誓师大会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于贵阳■

【资 料】

##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1967.03.02)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

今天，我们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您的亲切关怀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山东地区部队的全力支持下，奋起千钧棒，一举攻克了多年来一直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的省委、省人委这座顽固堡垒，宣告了旧省委、旧省人委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死亡和新的临时权力机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的诞生。我们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向您老人家报喜，祝愿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敬爱的毛主席：前山东省委、省人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以来，推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他们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挂帅，鼓吹阶级调和，大搞物质刺激，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行资本主义复辟。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又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动用专政机器，镇压革命群众，制造白色恐怖，大搞反革命经济主义，培植御用组织，借以保持自己的反动统治。当他们看到自己末日来临的时候，又与一些所谓“左派”组织的反动头目，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妄图保存实力，伺机东山再起。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看透了他们的反动本质，在大联合的基础上，组成了“三结合”的指挥中枢，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抓住战机，猛追穷寇，把他们窃踞的党、政、财、文等大权夺了回来。这个权夺得对！夺得好！全省的革命人民，扬眉吐气，齐声欢呼：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向您报告：在这场夺权斗争的大决战中，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山东地区部队，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革命行动，为夺权斗争

的胜利立下了辉煌的战功。他们不愧为您亲手缔造的人民子弟兵！他们真正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向您保证：我们一定遵照您的教导，继续扩大“三结合”的无产阶级革命大军，彻底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一定遵照您规定的政策，正确地对待干部。对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的革命干部，我们要坚决依靠，并肩战斗。对犯错误的干部，我们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团结他们做好工作；就是犯了很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也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立功赎罪。对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要充分揭露，把他们斗倒、斗垮、斗臭。我们一定响应您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挑起革命、生产两副重担，保证革命、生产双胜利！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向您保证：我们永远永远读您的书，听您的话，照您的指示办事，做您的好学生、好战士。我们要大破“私”字，大立“公”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炉中彻底改造世界观，誓把我们新山东办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让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永远永远普照全山东，全中国，全世界！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

【资 料】

## 北京市革委会给毛主席的致敬信

(1967.04.21)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在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斗争、大批判中，我们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向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报告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了！这是您的光辉思想的又一支响彻云霄的凯歌！这是以您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

在这无产阶级革命派最盛大的节日里，我们欢呼，我们歌唱，千万颗红心迸发出一个共同的声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毛主席啊，毛主席！当我们回顾我国革命的光辉历程的时候，千言万语倾诉不尽我们对您的无限忠诚，千歌万曲表达不出我们对您的热情歌颂，浩荡的大海容纳不下我们对您的无限崇敬和无限热爱。

是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缔造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是您点燃了井冈山上的星星之火，开辟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航程；

是您指挥中国工农红军跨过万水千山，实现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是您在永垂史册的遵义会议上，结束了“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奠定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基础；

是您在革命圣地延安，指引着抗日战争前进的方向；

是您统帅浩浩荡荡的人民军队开进北京，为古老的都城带来了春天；

是您在天安门广场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缔造了伟大的人民共和国。

在那漫长的战斗岁月里，在那波澜壮阔的革命征途中，您带领我们战胜了一个个的艰难险阻，闯过了一道道的惊涛骇浪，使灾难深重的祖国从黑暗走向光明，像巨人一样地出现在世界的东方，给世界人民带来了胜利的希望，像一轮红日喷薄而出，照亮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道路。

毛主席啊，毛主席！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您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率领我们开始了新的长征。

是您揭开了旧北京市委、市人委的黑幕，粉碎了隐藏在那里的一小撮野心家复辟资本主义的黄粱美梦；

是您亲自决定广播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是您主持制定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宣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拨正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航向；

是您英明地发现和热情地支持了威震世界的红卫兵运动，在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红卫兵小将们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建了不朽的功勋；

是您在北京检阅了来自祖国五湖四海一千多万文化革命大军，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

是您在北京发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进军令，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是您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动总攻击，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的伟大战役的进军号。

这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场面，这一幅幅惊心动魄的雄图，描绘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灿烂前景，谱写出您的光辉思想的颂歌，书写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雄壮的篇章，开创着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敬爱的毛主席，您教导我们：“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旧北京市委、市人委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支持、包庇下，把北京市搞成“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妄图把北京变成在我国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基地。十几年来，他们疯狂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目睹他们的滔天罪行，我们怎么能不愤怒？！怎么能不造反？！怎么能不夺权？！我们怀着誓死保卫您，誓死保卫党中央的决心，凝集起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向旧北京市委、市人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发动了猛烈攻势。当我们



刚刚打出第一发炮弹的时候，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抛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妄图在我们伟大的首都扼杀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了捍卫您的光辉思想，为了捍卫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造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揭出这条反动路线的炮制者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冲破了重重阻力，扫清了层层障碍，斩钉截铁，下定决心：坚决把旧北京市委、市人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彻底打倒！坚决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彻底的批判，把他扔到历史垃圾堆！我们决心把对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批判同彻底摧毁旧北京市委、市人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斗争结合起来，同本单位的斗、批、改结合起来，斩断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伸向各个领域的黑手！

敬爱的毛主席，您教导我们：“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心不死，妄图翻案；他们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进行反攻倒算，掀起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他们的总后台，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们要牢记您的教导：“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高举您的光辉思想的伟大红旗，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动总攻击，把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他精心炮制的大毒草《修养》批倒，批垮，批臭，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倒、斗垮、斗臭，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坚决完成您交给我们的斗、二批、三改的伟大历史使命，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敬爱的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是您提出来的伟大方针，我们一定要不折不扣地执行。我们一定要把革命放在首位，以革命统帅生产，狠抓革命，猛促生产，掀起一个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高潮，誓夺革命和生产的双胜利！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坚决执行和捍卫您提出来的革命的“三结合”方针。我们要在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战斗中，在彻底批判他在干部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过程中，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我们要坚决粉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伪装“革命”，

妄图钻进革命“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搞反革命复辟的阴谋。我们一定要夺好权，掌好权，用好权。

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决战的关键时刻，您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出了应该积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战斗号召。这是您对我们的最大关怀、最大支持。人民解放军是您亲手缔造的、林彪同志直接领导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我们要坚决粉碎阶级敌人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阴谋。我们一定要好好向解放军学习，和解放军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大力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镇压一切阶级敌人的捣乱和破坏活动，把人民的首都建设得像磐石一样的牢固，像钢铁一样的坚强。

毛主席啊，毛主席！您是我们的最高统帅，您是我们最英明的舵手，我们永远跟着您闹革命，永远跟着您在大风大浪里奋勇前进！谁敢反对您，谁敢诋毁您的光辉思想，谁敢对抗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就造他的反，就把他打倒，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向您宣誓：永远读您的书，听您的话，照您的指示办事，做您的好战士。我们一定要把“老三篇”和《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等光辉著作当作座右铭来学，在灵魂深处开展破“私”立“公”的大革命，大夺头脑中“私”字的权。我们一定遵循您的教导，边战斗，边整风。我们要大反无政府主义，彻底克服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念，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新秩序，巩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把我们的队伍建设成一支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队伍。

北京是伟大祖国的首都，是世界革命人民的希望和灯塔。在您的英明领导下，我们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信心百倍，斗志昂扬，一定要把北京建设成永远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最红最红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城市，建设成世界上反帝反修的社会主义红色堡垒。

最最衷心地祝愿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 ■

## 版 权 声 明

《记忆》创刊于 2008 年 9 月 13 日，是一份研究中国当代历史的电子刊物。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版面设计、专栏目录与名称等内容，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

未经著作权人明确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发行、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举报邮箱：dw66778899@163.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